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12月15日第30期 总第208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08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十六）

目录

【专稿】

川 文 《清华七二七事件》序

胡鹏池 但 桑 播种有生命力的思想

——《清华七二七事件》不结束语

【罗文胡注】

罗征启 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

第一章：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

——记1966年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胡鹏池 罗征启《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第一章评注

附件一：邵斌来函

附件二：刘冰：关于“八二四事件”的回忆

附件三：神逸（即马楠）的聊天

附件四：阎淮：关于“八二四事件”的回忆

附件五：胡鹏池：叶不落归树！——读老淮文章有感

【读者来信】

小鹰谈高校文革史的编写

【本刊声明】

【专稿】

《清华七二七事件》序

川 文

—

庸常的日子大抵雷同，容易淡忘；革命的岁月风起云涌，记忆难以磨灭。在清华文革“老五届”的脑海里，1968年7月27日永难忘怀。

是日晨，数万之众的军民队伍，以“首都工人、农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开进清华制止两派武斗，遭蒯大富为首的团派武装抵抗，发生5死731伤的重大血案，史称“727事件”。

历数文革大事件，论冲突规模、伤亡严重，“727事件”与重庆、广西武斗相比，无异于小巫见大巫；若论轰轰烈烈、影响广泛，也无法与上海一月夺权相提并论；“727”既没有武汉“720事件”那样惊心动魄；更比不上“913事件”那样神秘莫测；尽管如此“727事件”的重要意义，却足以与上述事件比肩。但迄今为止的文革回忆和研究中，“727事件”普遍被忽视，除唐少杰的《一叶知秋》以及若干亲历者的片断回忆外，以之为主题的文革史著述，至今阙如，诚为文革史，特别是清华文革史研究之缺憾。

近闻胡鹏池、但燊的新作《清华“727事件”——1968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以下简称《清华727》）即将付梓，即翘首以盼，欲一睹为快。

窃以为该书题材选择眼光独到，出书时间恰到好处，担纲作者亦难匹俦，为文革史研究补充了重要一页。欣喜之余，忽得作者书札，嘱我作序。笔者不胜惶恐：大抵德高望重、名彦硕儒方有作序的资格。而时下风气，则多求大吏高官为之。不才一介工匠，向与文坛无缘，何德何能敢斗胆为之作序？然另请高明的建议未得俯允，得悉此一次优之选，实为作者无奈之举。既然无序不成书，总得有人勉为其难。与其请对727不甚了了的名家，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甚至脱离本书宗旨信口开河，倒不如约727的亲历者，秉“释其名而

彰其义”之旨，做一点背景介绍，写几句读后感言，至少还真实可信。且在立场上，也符合余英时先生《原序》中所主张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于是笔者不揣浅陋、斗胆捉笔，不敢以“阐弘大道”自期，但求“推演事义”，为作者开门揖客。虽难匹作者之雅望，总不至令此煌煌大作，落得“卿本佳人，奈何无序？”的嗤笑。

尽管近年文革研究似为禁区，但海内外相关著述仍薪火未绝。在众多撰述中，《清华727》的选题，可谓独具慧眼。文革大事，如八届十一中全会，丙辰怀仁堂之变者，基本大白天下。而如林彪913事件者，秘档不宣死无对证，真相雾锁深山，文章无法可做。唯727事件，虽内幕若明若暗，倘用心发掘，钩沉索隐，玄机大抵可辨。也就是说既有文章可做，文章也做得下去。

说该书选题眼光独到，更在于727事件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它既是文革行至中场，当局调整战略，运动发生重大转折的里程碑，也是一场内容丰富、情节曲折、阵容豪华的政治大戏，蕴藏着可资研究的宝贵资源。以727为界，十年文革可划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的战略是“破旧”——鼓动造反、天下大乱，主题词是“放”和“乱”；下半场则是“立新”——平息动乱、恢复秩序，致力于“收”和“治”。契合文革发动者总结的“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清华727，则是继“七·三”、“七·二四”布告等重拳之后，在皇城之下、文革造反重镇之一的清华，由最高当局亲自策划的治乱战役，是上下两个半场战略转折的显著标志。

727也是文革斗争方向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文革前期的主攻方向，无疑是各级“走资派”。经历了1967年的大风大浪，特别是720事件，遭遇军方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强烈抵抗后，毛终于不得不囚王关戚以谢天下；放弃大民主、“巴黎公社”等乌托邦的幻想；不得不接受官僚阶层难以根本撼动、仍是其无可替代的统治基础的现实，回到“朕与卿等共治天下”的轨道。在刘邓已被打倒、官僚阶层也受到不小的冲击洗牌后，不再把“走资派”作为斗争主攻方向，以免乱局难收，动摇统治之本。调整斗争方向的令旗，就是文革乃“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一最高指示，于是历次运动被迫害的“黑七类”再次遭殃，

成为转移斗争方向的牺牲。此后清理阶级队伍、清“516”、一打三反，一波又一波对草根贱民的迫害，得到文革中各级当权派的坚决拥护和变本加厉的执行，其持续时间、迫害范围和残酷程度，远甚于此前对“走资派”的斗争。

727 还标志着文革组织领导方式的根本转折。此前传统的各级党团和官方组织被踢开，最高当局以军队为后盾，通过“两报一刊”和广播电台，直接面向全国动员指挥。对各地各系统问题的处置，则是通过一场接一场的中央领导接见，听汇报发指令。即使是 1967 年各地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其功能也只限于维持经济和行政事务，基本不具备领导文革的政治权力，北京市革委会对清华、北大的武斗无可奈何，即为明证。自 727 始，情况发生了改变，进入清华的宣传队以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的名义派出和指挥，宣传队其实就是历次运动的工作组，至多后来有武装军人压阵，可以算是武装工作队。除 7.28 凌晨在非常情况下临时接见外，中央领导事先既未接见，事后更如蒯大富所悲叹再也见不着面。自此对运动的领导和指令，转而主要通过内部文件逐级下达、而非报纸电台直接昭示全国，中央首长接见群众组织基本停止，随着各级党组织的逐渐恢复和军队全面介入，对运动的组织领导，基本回归“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传统治理科层体制，因军队的介入近乎四九年进城初期的党军体制。文革领导方式的这一根本转变，727 可视为其分水岭。

最后，727 标志着喧嚣一时的红卫兵运动，终于落下大幕。以蒯大富为代表，“造反派”及头头们的作用、地位和命运，从此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除上海等地因有张、姚、王等文革新贵的特例外，俗称“造反派”的多数群众组织头头和骨干，遭到整肃清洗。充当过文革急先锋的“造反派”，不但为“走资派”所不容，而且越来越不听招呼，胡乱“炮打”、分裂内斗、偏离大方向不断制造麻烦，树敌颇多，令人侧目。尤其是各地造反派私下串联，可能成为卧榻之侧新的异己力量，而且有被黑手操纵的嫌疑，触犯了天条，引起当局的高度警觉和戒备。“北航黑会”受到的格外关注和敌视，可见一斑。自 728 接见之后，头头们被关进自我认罪、相互揭发的“学习班”，从逐步边缘化到被整肃，直至沦为

阶下囚。造反派的失宠，固然是兔死狗烹的老戏码，不作不死的新贵故事，而 727 前后的事态发展，更清晰地展示了这一颠覆性改变的来龙去脉。727 后，以“六厂二校”为样板，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为旗号，开始对大学实行军管，推进迫害教师、摧毁教育的“斗批改”和“教育革命”。而在红卫兵发源地的中学，昔日的红卫兵被动员发配下乡，红卫兵运动自此谢幕成为历史。

727 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毛对此次行动的格外重视，得到印证。毛一反不过问文革具体事务的常态，亲自对 727 策划部署，在文革中可谓绝无仅有；文革虽用兵频频，但 727 出动了以警卫军 8341 部队为核心的 300 多名官兵，也是只此一例；“中央首长”文革接见虽数不胜数，但除广场大规模接见红卫兵外，毛、林、周及所有文革要员悉数到场、小范围接见群众组织头头的，更是 728 仅有的一次。如果说文革初期毛关注清华、重视蒯大富，是因为在打倒刘少奇的关键时刻，蒯是颇具杀伤力、也最顺手的一块石头，那么到了 1968 年，蒯已势成鸡肋，毛为何还对清华文革如此重视？其实他所重视的，不是清华的 727，而是 727 的清华，是从 727 入手实现文革的战略转折。

由 727 引发的 728 凌晨接见，俨然成为各路神仙的一场精彩演出。舞台上文革要员们态度的同中有异、情感的难得流露、关系的微妙幽暗、话语的多彩风格，令看客们对这出戏的舞台背景和演员关系，乃至对整场文革大戏，会有更生动深入的理解。728 宝贵的谈话记录，太值得仔细品味、联想和思考，是品位极高的文革史研究富矿。自此再往后延伸，“727 事件”还是“梁效”登台、批邓导火线等文革后期热点的渊源所在。说 727 对文革研究有重大意义、称本书选题独具慧眼，应该不是笔者的夸张。

如此重要题材的著述，成书于当下，时机也颇为恰当。史学界似有事件发生三十年之后，方可进入研究视野的约定俗成。写得太早，缺乏历史距离感，视野既不免逼仄、观点亦易为情感所局限。尤其是作者的见识，尚未经阅历陶冶、岁月沉淀，笔端所至，或缺少陈寅恪先生主张的“同情之理解”。但倘若至今再不成文，随着一代亲历者日渐凋零，无论是对事件的回忆、史料的蒐集，还是对知情者的访谈、当事人的求证、以及得到各方面

的批评指正，都将大打折扣。即使有后来者今后对 727 再有所撰述，但要做到本书那样内容具体翔实、背景把握准确、读之有现场感，几无可能。而且此书在当下而不是十年前付梓，还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如今许多亲历者不愿重提文革伤心经历、对本书作者的旧事重提不理解、不赞成、不配合，但曾几何时，文革幽灵却“似曾相识燕归来”，通过对文革的揭露和反思，让年轻人认清文革的本来面目，两位作者推出此书，可谓正当其时。

二

一本书的成败，比题材选取恰当、写作时间合适更为重要的，当然是作者的资质。笔者以为胡、但两位完成此书最堪胜任，并非溢美之辞。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秉亚圣之训，谨对作者其人略加介绍：胡鹏池乃江东人氏（江苏南通），1962 年入清华就读机械系，1968 年底毕业离开清华，职业生涯略有曲折终归平淡，谋于稻粱之际仍笔耕不辍。但燊系楚人，1963 年考入清华自动控制系，1968 年毕业离校。两人清华文革皆参加 414 派，但燊在清华“百日武斗”后期还负责过防务，被同侪戏称“但司令”。其实但燊性格温文敦厚，和 414 绝大多数武斗留校的同学一样，绝非勇武好斗之辈，而是念及同窗好友尚被困于科学馆内，出于义愤和义气，无奈充当了 414 的廖化。胡氏在学生时代即喜舞文弄墨，且文采斐然。文革前有不少文史禀赋优异的学子，囿于时代潮流，报考了理工科的清华，鹏池先生当属此列。称其为清华 727 最称职的记述者，还基于以下四点：

1. 亲历事件。两位都是 66-68 年清华文革的深度参与者，但燊还是清华武斗和 727 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对 727 事件的真实场景和背景起因，当时就了解比较全面，认识亦颇有深度。因经历情感所系，多年来对 727 话题一直十分关注、并收集相关史料，也有比较深入的反思。笔者读各类文革史著述，非亲历者的文字，每令人有“隔”之感，着墨类隔山打牛，陈情似隔岸观火，议论更难免隔靴搔痒。而亲历者笔下如临其境的现场感，生动真实、令人信服的事件逻辑，读之让人不忍释卷。以清华文革为例，若干市井媒体后生，

凭道听途说编造的清华文革故事，看几行就只能扔在一边。老托尔斯泰描述贵族生活栩栩如生、写到战争场面却顿失光彩，正是亲历和不曾亲历的巨大反差。即使是笔者素所尊崇的钱理群、秦晖先生亦不能例外，钱先生用自己发明的独裁、官僚、群众三种政治的理论框架，根据可疑的二手传闻，演绎出的清华文革故事，一看就知道作者文革并不在北京、更不在北大清华。秦晖先生从全国看清华、揭示广西 724 布告和清华 727 的内在联系，分析 727 的发生背景，对某些沉湎于从清华看全国、几十年后仍懵然无知的当事人，不啻有醍醐灌顶之效。但涉及清华文革和 727 的具体情节和场景，则每每“郢书燕说”，虽不失“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但离“语时事则指而可想”，已经相当遥远。当然，在 727 团派与宣传队的冲突中，414 基本上是旁观者，对事件的回忆，虽不难做到冷静客观，但因为并未介入，对冲突双方的行动细节、特别是决策过程，缺乏第一手的了解，叙述中难免有缺失片面、不够准确、甚至失实之处。相信作者会诚恳欢迎当事人、特别是团派诸位头头，予以实事求是的匡正。更期望他们能本着对自己、对事件中贾祸的同学、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也写出亲历者全面真实的回忆。

2. 政治正确。该词时下虽几近贬义，但笔者仍坚持认为，记述 727 这起重大政治事件、回顾人性得以充分暴露的大规模流血事件，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人文关怀，皆不可或缺。站在为作恶者袒护辩解的立场、或貌似超脱实则伪善的态度，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必然导致对史实的刻意隐瞒和歪曲解读。笔者所说的政治正确，既非革命喉舌的陈词滥调，更不是庙堂之上的站队看齐。而是雨果所言：“在至高无上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在反对武斗、不满文革人群的内心深处，政治正确并不是狭隘的派性纷争，而是人道主义的良知和情怀。满脑子人文自由、一肚子不合时宜、虽然也读过一些马列的书，但除了“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之外，却依然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的鹏池君，担纲此书的写手，当然是不二人选。相反笔者很难想象，如果由至今仍怀念当年“盛大节日”的文革活化石，由对莫须有的“思潮必胜”念兹在兹的“理论家”，由标榜最早反对文革、实则文革“冲锋队”的老红卫兵，或者让不知家国情怀为何物、但求听话出活的红

色工程师们来写 727，会持何种立场、会写出怎样的场景、又能给读者什么样的启发？

3. 秉笔直书。笔者与两位作者是同时期的校友，在校时多有过从、亦颇知其为人。特别是鹏池先生，虽貌似儒雅，实性近子路。对灭绝人性的革命暴行、罔顾真相的政治谎言，一向深恶痛绝、不假辞色。其发微钩沉、还原历史真相的能力和效果，或有可商之处，然秉笔直书、力求忠于史实的态度和立场，则毋庸置疑。况言出有据、逻辑严谨，本乃理工学子叙事之优势。和大嘴文人的天马行空、信口开河，判若云泥。其人其文，与班固所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庶几近之。

4. 言而有文。叙述清华 727 的庞大场面和复杂人事，自然要有相当的文字功力，“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如笔者等，绝难担当此任。鹏池先生长于写作、素有文采，在校时即稍有文名，近年更驰骋文坛，有《芦花瑟瑟》等文章作品面世，一不小心俨然跻身文坛作家之列。近年《清华园的一只蝴蝶》一文，依据有限但可靠的史料，以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缜密推理，还原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伊始，周恩来亲临清华蒐集材料、为毛氏《炮打司令部》提供要害炮弹的史实。凡当年亲历者，相信读后皆不得不为之叹服。胡、但在本书写作中，仍沿用推理考证之笔法，且行文汪洋恣肆、娴熟老练，笔端热烈情感和冷静理性兼具，可谓文质皆胜、文质彬彬。

当然，对本书的观点和写法，笔者并非毫无保留。兹不避浅陋，略加点评，亦可借此就正于读者和作者。首先是本书体裁，作者名之曰“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这就让落伍如我，很有些费解。虽然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具体到一篇文章、一本书，究竟属于历史还是文学，古今作者和学界皆有明确定位，并不含糊。本书倘冠名“历史文学”，按汉语语法修辞，即属虚构的文学范畴，不限史实、毋庸考证，严密的逻辑推理更形同蛇足。但这本书的宗旨和写法，却明明又是春秋史笔，与书名大相径庭。在历史本该止步之处，却任文学的笔端徜徉，岂能以史笔存世？叙述历史却立意文学，行文之间，于史事或偏爱戏剧性情节，于人物则钟情脸谱化描述，难免和忠于史实的初衷相悖。文学的热烈情感，也会妨害在回顾历史时，做到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冷静客观。出于对文学

情结的不舍，以及对此前作品中推理成功的方法自信，本书在史料蒐集考证和情节演绎推理之间，略显失衡，有本末倒置之憾。推理固然要有相当的能力，也具备重要的价值，但再高超的推理，也抵不上一条可靠的原始史料。蒐集史料固难，但有些并不难做到的当事人访谈，似乎功夫还下的不够。特别是以“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为理由，拒绝就有关情节向态度相左的当事人求证，诚为失策。其实无论今天当事人如何回答，都是可资参照考证的资料，哪怕是谎言，既不难揭穿，也足以刻画半个世纪后各色人等的态度，立此存照，又有何妨？此种武断或导致该书本可避免之硬伤。总之，在古老的历史和文学之间，硬要创新出一个性别可疑的体裁，难免因辞害义、招致误解。对所谓“逻辑性历史文学”的体裁，笔者委实不敢苟同。

其次是对 727 事件的基本背景、即清华两派之争，缺乏介绍，不知系无心忽略、还是刻意回避。这必然让局外之人、后世读者，对本书的理解发生困难。进入 1967 年的文革，各地各单位的群众组织，普遍形成刀枪相见、你死我活的两大派。其原因和规律值得专题研究。两派都高举文革大旗，崇拜红太阳、斗争走资派、砸烂旧世界。除了少数地区确有受权力当局操纵的“保皇派”外，大多只是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历史、对具体的人和事、对权力的分配争夺，存在分歧对立。清华的两派并无特别之处，声称两派分别代表正确和错误的观点和路线，实大谬不然。蒯大富麾下简称团派的井冈山兵团，无疑是典型的文革造反派，亦深得毛和中央文革支持，得到各地造反组织的拥戴。但一时风光无限的蒯大富们却因此头脑膨胀，不断为自己挖坑导致垮台，应了那句老掉牙的话：“上帝让你灭亡，首先让你疯狂。”而 414 不过是清华园里当时的反蒯联盟，思想和组织颇为驳杂，在反蒯的过程中，逐渐滋生了对文革和中央文革的不满，以至于按“对 414 也要区别对待”的最高指示，沦为需“区别对待”的另册。414 反对中央文革，虽仅限于腹诽偶语，但多半拜蒯大富小报告所赐，文革当局对此早有成见，这并非今日之自矜，而是有 728 接见时的“御赐”：先是江青一吐为快：“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毛也毫不掩饰：“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江青于是干脆明说：“四

一四是反对我的。”看齐意识很强的谢富治不甘落后：“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而所谓“414思潮”，不过是414里的几个人，本着或许良好却失之片面和幼稚的模糊愿景，编造的一个清华梦，并未摆脱文革专制思想的镣铐和牢笼。既不能代表414大部分成员的真实思想，更不曾成就过够得上“思潮”的宏大气象。只是728经领袖加冕，令个别人从此自恋自信，象莫泊桑《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对此没齿难忘、堪为悲剧。与所谓414思潮不同，414在武斗前后的表现却可圈可点：武斗前坚决反对团派挑起武斗；武斗发生后强烈要求制止武斗；最后727全力支持宣传队平息武斗；书中对武斗问题、特别是727事件中两派的是非曲直，没有刻意回避，对各色人物的言行臧否，同样秉笔直书，这或许会被某些人指责为派性。但如果所谓派性，是以被文革当局宠爱有加还是被视为须“区别对待”的另类、是以挑起武斗不惜杀戮同窗还是坚决反对武斗、是以否定文革还是怀念文革来划分，那这样的派性指责，无异于是对该书政治正确的褒奖。也许有人又要说，414反对武斗，是因为在武斗中处于劣势、制止武斗对414有利。笔者作为亲历者必须澄清，414在武斗中的劣势其来有自，一是因为本来反对武斗始终处于守势；二是领导层头脑清醒，秉持对自己、对同窗负责的人道精神，禁止主动伤害和采取极端手段；三是414乃“在野党”，无武斗资源优势；四是外部特别是高层对蒯大富的支持。但无论如何，在727这一天，同一支手无寸铁的宣传队、事先并无任何倾向，队伍同时开至清华两派据点、同样要求“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武器”，一派“无为无不为”，合作执行、毫发无伤。另一派则无所不为，断然拒绝、疯狂对抗，甚至开枪扔手榴弹致使多人死伤。让原本不持立场的数万宣传队员，顿时对清华两派有了鲜明的善恶或曰派性，毛、江对此也只有顿足骂道蒯大富真蠢。无论事先对清华两派有过怎样的成见，无论是当时还是在今天，恐怕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任何理由，说727事件中414有任何过错、团派又正确在哪里，能给出与本书相反、没有“派性”的记述和评价。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年龄相仿、教育环境相同、家庭背景虽形形色色但并无相关性，学习生活在同一校园内的学生，对文革、特别是对武斗的立场和行为，

为什么居然如此泾渭分明？借用宣传队成员的话，“咋就差别这么大呢？”解释难免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或自以为是、或怨天尤人。笔者对此亦曾思索良久，一时不得要领。后读阿伦特似有所悟：文革中多数荒唐行径乃至罪恶暴行，皆属暴力革命大潮中“平庸的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无论是俄罗斯十月革命、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还是绵延千年的中国农民造反和内战，“平庸的恶”皆充斥其间。但另有一种恶，姑名之曰“权力的恶”或“台上的恶”，也值得关注和研究。在专制统治或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哪怕只是局部和暂时的权力，都会严重腐蚀执掌权柄的一方，令其犯下的罪与恶，远甚于尚未掌握太多权力的在野一方。并非是后者比前者有更高的道德情操，而是一切权力都具有自我维系和巩固的本能，不择手段，借助无从制约的专制权力或以革命的名义暴力作恶，是取得和巩固权力的首选和捷径。其最高形式，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杀戮，就是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权力不但是腐败的土壤，也是暴行的温床，绝对的权力导致极端的暴力。当这种杀戮和迫害是以革命的名义、或高举崇高理想的旗帜，犯罪者则更加理直气壮和肆无忌惮，后果也更为恐怖和惨烈。蒯大富们信奉只要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大兴和道县令人发指的文革惨案，皆为铁证。后者尚无更多作恶的权力和资源，只能主要以道义为号召，吸引理想主义者和社会精英，获得大众同情和支持。一个甲子的国共斗争史，逃亡之前的国民党尽显权力的恶，占领道义高地的中共，一度对普世价值的呼唤，亦自有其真诚和理想主义的成分。中共停止内战的呼声，和 414 对制止武斗的诉求，本质如出一辙。然而一旦形势反转，权力的恶又将重演轮回的悲剧。环球百年，慷慨激昂的革命者，倘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最终变身作恶多端的独裁者，类似的故事一直在上演。台上的刘少奇，说党的决议就是法律，被赶下台后，却想起诉求法律保护自身人权。同一个蒯大富，从自己被王光美限制人身自由、到在“罗文李饶”法西斯专案组中迫害师长，相距不到一年！414 在武斗和 727 事件中，之所以没有更多的作恶，无关道德、更不是思潮正确，而是 414 彼时和权力的恶，还基本无缘。同样 727 后在清华掌权的，如果不是迟群而是蒯大富，权力之恶恐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书还有一点缺憾，或属笔者的求全责备。鲁迅批评中国传统史籍体例，多聚焦庙堂，不啻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诚切中要害。此弊来自家天下的政治体制，皇帝就是政权、政权就是国家，不可以苛求于史家。写文革和清华 727，倘能不完全落此窠臼，当可令人物光谱更为丰富、历史内容更加厚重。也就是说，蒯大富们固然是 727 当然的主角，大会堂里的各路神仙更关键重要，但此外还有许多情节和人物值得一书，不应吝于笔墨。首先是作为事件的另一方，宣传队各工厂的领队和普通工人军人，他们不应该仅仅出现在冲突现场和伤亡数字中，他们在 727 前后的所见所闻、所言所行，生动宝贵的史料值得发掘。伟大统帅口中的“炮灰”，即清华双方武斗人员、包括为团派助战的外地人员，他们参加武斗的原因和想法、他们在 727 的所作所为、他们后来的典型遭遇，似亦可单辟一章。“炮灰”们的家长、清华园的普通居民、清华周围和北京城里的市民对文革、武斗和 727 事件的看法，对于叙述和理解清华 727，亦不可或缺。当然增补这些内容，显然超出两位作者目前的条件，不知可否期待未来的续篇或作者。

三

美国社会学家 Wrong 有言：“脱离了问题，答案没有意义。”笔者赞同此说，在本序最后，不避续貂之嫌，蛇足之讥，就 727 的若干问题略加探讨，既对一直为 727 当事人所困惑的问题，尝试作一些解答，也希望借此能帮助读者，对 727、对文化革命有更清楚的认识。

本书读者多半会奇怪，在首善之区，距中南海仅数公里的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园，当局怎么会容忍武斗双方筑工事挖地道、拼长矛动枪炮、纵火杀人近百日，却不去制止无人过问？据《清华 727》书中介绍，清华武斗初起，驻校海军宣传队、北京卫戍区、市革委，都曾出面制止但毫无效果。诡异之处在于，一天后所有来自官方的声音和行动皆嘎然而止，放任清华武斗继续和升级。作者以为，这个“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方针的决策者，

舍当时一言九鼎的毛外别无他人，而毛之所以有此貌似不合清理、不负责任的指令，或者有以下考量：

1. 尽人皆知，在清华两派之争中，毛江夫妇毫不掩饰对蒯司令的支持。但 67 年底，毛和中央已经对全国的派别之争，确立了要求实现大联合、不支一派压一派战略方针，如果出手帮蒯压垮 414，会制造一个错误导向的范例，不利全局。何况四面出击的蒯大富在上层树敌颇多，一边倒支持蒯同僚们也很难赞成。而且 414 人数众多也有一定影响，背后有没有上层势力暗中支持亦未可言，搞不好会造成三军无革派及其对立面那样的乱局。但蒯大富倘若能仿效武力打垮上柴联司的王洪文，通过武斗一举平定 414，毛、江应该是乐见其成。对清华武斗不闻不问，无异于放手让蒯司令开打，但等清华捷报传至中南海。只是蒯司令和 414 的实力对比及武斗进程显然遭到误判，战端虽开却久拖不决，等不到捷报又影响全局只有出手制止。所以 728 接见时毛说：“414，几千人，你搞也搞不掉”、“要消灭 414 也不行”，遗憾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2. 原来设想文革半年或一年收场，但两年过去，文革前期风云际会的北京高校，多数仍深陷派仗毫无头绪。当初天下大乱仰仗北京高校，如今由乱到治也必须先把高校搞定。但北京高校文革究竟如何收场，毛在四月也许还没有考虑好最后方案，或者上层之间还颇多歧见，暂时不闻不问，也是权宜之计。

3. 政争中毛的敌情观念之强，无人能出其右，晚年尤甚。728 接见毛说武斗还有一个好处是“要暴露坏人”，同时宣称怀疑 414 背后有黑手，又敲打蒯大富系被人操纵，不难窥见其放任武斗暴露坏人的心机。本想再演一出引蛇出洞的拿手好戏，不料这一次蒯大富却把他当成了黑手。

在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中，抓点或曰蹲点，和搞运动、派工作组一样，是传统保留节目。首长或代表首长的夫人、下属到基层抓点，按官场潜规则，其他人一般不染指过问。自 66 年 7 月中旬起，清华文革已被毛格外关注，“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毛不开口，其他人只有、也乐得作壁上观。直至 727，无论是老蒯纵火杀人、还是 414 请

愿抬尸游行，如此严重破坏首都秩序、影响当局形象的行为，各级大员统统若无其事，再也无人过问。

那为何到了68年7月，毛又下决心出手制止清华武斗？这要“从全国看清华”。67年武汉720事件后，当局一改“文攻武卫”、“武装左派”、“抓军内一小撮”的号召，抛出“反军乱军”的替罪羊“王、关、戚”。平息武斗、弥合派争、稳定局势，成为调整后的文革战略大方向。但直到68年二季度，大乱的局面仍远未得到控制。彼时刘邓落马已成定局，“杨、余、傅”事件后党内派系暂得新的平衡，召开十二中全会、以全会的法定程序背书二年来的文革成果，为召开九大作准备，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制止武斗恢复秩序、特别是恢复京城秩序，已然是当务之急。在六月中下旬，高层应该对此曾专门研究并作出决断，毛在六月也就此多次放出口风。从“七.三布告”开始，一连串重拳出击凌厉果断。然清华枪声不止，何以号令天下？京城百姓及大小官员，对清华武斗早已啧有烦言，当局为此受到的非议和压力，从被414窃听的谢富治致蒯电话中，亦可见一斑。尤其是进入七月，清华战火愈演愈烈、濒于失控，毛终于再也不能坐视不管，出手制止清华武斗，已成弦上之箭。可惜蒯大富和他的总部委员们、以及麾下的谋士高参、动态组联络员，统统被革命、权力和宠信冲昏了头，居然对此浑然不觉。

理解了对清华武斗先放任后制止的前因后果，可能又有人要问：制止清华武斗途径本可有多种选择，既可以遣一哨官兵直接平定；也可以如六六年八月，派文革大员进校宣旨；还可以将728召见提前，事先陛前训示。以上方式皆可传檄而定，为什么却要派数万“宣传队”徒手开进清华园，采取这个貌似颇有创意却最终酿成冲突伤亡的方式？

这就要从派“宣传队”制止武斗的发明人说起，68年夏安徽芜湖武斗正炽，在安徽“支左”的驻军12军军长李德生，以强大武力为后盾，单刀赴会进入武斗据点、晓以大义震慑各方，遏制了武斗升级势头。后又于68年7月初，从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五个地区，抽调大批军队和地方人员，组成强大的宣传队伍进入芜湖，不开枪、未流血，一举平定了全省最严重的芜湖武斗。毛对李德生此举大加赞赏，历来倡导“从群众中来”、

又正在考虑如何平息清华武斗的他，必定深受启发乐得效仿。移植安徽经验，组织数万工人进校园“宣传”，师出有名、浩浩荡荡，在酷爱并擅长群众运动的毛心目中，此方案自属首选。同时身边警卫军的官兵，正在新华印刷厂等六厂“支左”，有直接策划指挥之便，芜湖经验的清华 727 版，由是应运而生。惜乎剧本虽好，但清华和芜湖的舞台环境和演员阵容，却迥然不同，清华 727 这场戏，还是演砸了。

明白了 727 为什么采取派“宣传队”的方式，接下来的疑问就是：多年来难得走到前台表演、也基本不介入文革具体事务的毛，为什么对清华 727，要一反常态、亲力亲为呢？无论是毛自认“黑手”的讲话，还是自周以下一干要员，发生冲突后不敢做主、无所作为的态度，以及谢静宜等当事人的回忆，都充分表明：727 事件唯一的策划人和总导演，非毛莫属。伟大统帅戎马一生，在地图边调兵遣将或属习惯和爱好，但深层次的原因，恐系以下二点：一是文革前后，毛对同僚及下属已经缺乏信任。从谋划文革时派江青南下沪上，到文革后期留毛远新在京当联络员，其对同僚的提防和猜忌日趋严重，基本上是“你办事，我不放心”。清华武斗事虽不大，影响却不小也十分敏感，委托何人颇费思量。727 宣传队进清华，周或事先与闻其事，但显然并未参与策划，更不曾得到全权相机处置的授权，这从周破例夜半电话叫醒毛可以得到印证。六六年八月周秉承旨意在清华干的不错，为十一中全会黜刘打开了突破口。然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共同的对手已去，这次周还能不能忠实贯彻自己的路线方针，实难逆料。江青政治上固然可靠，但从她对清华两派和蒯大富的态度、以及 727 前后特别是 728 接见的表演推测，很可能她并不赞成 727 不偏不倚的做法，而且演员出身的她，平时处理政务不过因人成事，真要独当一面去搞定清华，多半搞砸。张、姚毕竟是书生，调兵遣将非其所长，而且北京不是他俩的地盘，既师出无名，更难以指挥。军委办事组那边本已尾大不掉，让他们介入不但请神容易送神难，还可能将军队的派系纷争带入清华、乱上加乱。北京市谢富治这几个倒是唯命是从，但领会和贯彻战略意图的水平差距不小，而且蒯大富压根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搞定小小清华园，居然无人可以信赖委托，只有自己出面。由此亦可理解，文革中那个副帅即第二号走资派，为什

么一直给其留有后路、充作战略后备。

另一原因，则是对形势的误判。本以为有禁卫军亲征并充当指挥和后盾，由北京市和卫戍区出面，数万工人出其不意大兵压境，几百人的武斗队必定望风披靡，兵不血刃即可凯旋而归。最多一直不听话的414制造点麻烦，正好趁机修理他们。自然无需另外指派火线总指挥，且卧榻安睡，但等明日胜利报告。然而事态发展却出乎意料，至少有八个没有想到，导致了对形势的误判和失算：1，没想到蒯会武装抵抗。听到蒯派开枪、宣传队多有死伤的电话时，毛的第一反应是“造反派，真的反了！”比愤怒更多的情绪显然是大感意外。可为佐证的是，据“宣传队”的工人事后说，工厂领导当日晨布置任务时，根本就没提到万一遭到抵抗该如何应对。说明布置727行动时，虽然毛也提到可能会流血，但从上到下，并没有为遭到抵抗发生冲突做任何认真准备。2，没想到本来打算搭个梯子，让骑虎难下的蒯司令下台，蒯却认定是“杨、余、付”黑后台操纵。既缺乏沟通，又想不到一块，梯子变成了陷阱。3，毛毫不掩饰“我才不高兴那个414”，却没想到对宣传队，“414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反而”的口气显然是意料之外。414在727无可指责、上下得分，清华今后的戏不大好唱，毛只有悻悻而言：“现在414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4，没想到临时动员的几万工人，不可能象纪律严明的军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抵抗就有冲突，有冲突势必升级甚至流血，直到开枪死伤多人。宣传队必然群情激愤、撸起袖子准备打，局面完全可能失控。5，没想到清华的团派武斗据点内，除了本校学生，还有蒯司令的外省战友，其中不乏历经武斗沙场的凶悍之徒，他们多半不会在727置身事外。6，没想到北京清华和安徽芜湖的形势格局大不相同。没见过大世面的安徽造反派，哪能想到“杨、余、傅后台”那么复杂的背景，哪有胆量和驻军直接对抗？蒯大富却自恃毛、江是其后台，压根不把北京市放在眼里，当然更不把来路不明的“宣传队”当回事。在安徽制止武斗，有李军长亲临一线指挥决断，自然稳操胜券。北京这边虽高官如云，却没有责权高度集中的“李军长”。7，没想到清华727枪声一响，大小官员、各路人马谁也无从定夺，只有请示周大管家。精明如周，深知圣意难测，既然事先未被委托授

权，何必冒风险去收拾局面？只有破例叫醒梦中人请示定夺。8，原来设想 727 行动自己只要幕后策划，在地图边向几名亲信面授机宜就万事大吉。没想到出师不利事情闹大，还必须亲自出面才能收场。经济学家奈特说过，企业家的价值在于把握不确定性，其实把握不确定性对政治人物而言更为重要。毛对 727 剧情发展的不确定性，缺乏预判却师心自用亲自导演，显然应负演出失败的主要责任。

毛之所以不让别人插手 727，应当还有两个小算盘。一是如果委托他人去清华，担心对清华两派，他的态度和立场不能得到忠实体现和贯彻，此前派到清华的海军宣传队即为前车之鉴。毛、江从不掩饰他们对蒯大富的偏爱和支持、以及对 414 的反感和不得已。他们也清楚蒯在上层并不招人待见，728 接见各方首长对蒯轮番批判围攻，为蒯说好话的也只有他俩。其中固然有外交部两个小耗子说的他们做脸、别人做屁股的情状，但对蒯等动情之处，却也并非全是做戏。毛不问情由，命令立即在大会堂前释放鲍长康、江对陈育延的特别关照、毛退了场又返回叮嘱不要整蒯大富，皆为明证。他们应该估计到，派别人去清华，蒯多半没有好果子吃，而至少在 727 之前，毛对蒯仍然抱有不小的期望。另一个小算盘，则是要借机栽培昵称小谢的谢静宜。毛在晚年，“内举不避亲”，对亲属和身边人的着意提携，有目共睹。虽然后来张姓女子入常的名单真伪莫辨，但小谢可是从 727 开始，几年内从一名机要员，跃升至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据说差一点还当上了副委员长。无奈 727 前小谢既无从政经验和资历，又寸功未立，如何拔擢？无论是派长子入朝、还是叮嘱江青要“立新功”，以及文革初推荐《触誓说赵太后》，不难窥见打天下出身的领袖培养身边人的思路。派禁卫军出征清华，让奉旨出朝的小谢出头露面，参与平息清华武斗这桩貌似风险小、影响大的差事，机要员的升迁就有了铺垫。虽然迟群小谢最近在新华印刷厂作出了些成绩，但率领千军万马进清华，只有亲自担纲 727 总导演才方便点将，否则海里人才济济，哪里轮得上小谢？小谢这位通天的机要员，经 727 亮相，就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但点将小谢显然不合常规，和小谢中间隔着好几级的上司、海里大总管汪东兴，不但没有在 727 现场抛头露面，而且 728 接见时众大员皆谈锋甚健，

唯独汪一言不发，倘有所纠结和不满亦在情理之中。也许有人要指责此推测系诛心之论，但倘非如此，为什么小谢恰恰在 727 后，被完全不合常规地提拔？为什么在清华秉旨当差卖力气的是迟群，青云直上的却是传旨的小谢？刘冰告迟谢后，毛为其不平云：小谢是率领三万工人进清华的。足见 727 毛安排谢出场的机心。到了丙辰年覆巢之下无完卵，又是“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迟银铛入狱、谢却得免牢狱之灾。

727 最大的谜团，也是蒯大富们的最大心结，就是他们忠心耿耿跟着伟大领袖闹文革，一向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和偏爱，直到 728 接见，伟大领袖对蒯大富仍然关爱有加，为什么 727 如此大规模行动，事先不派人知会一声？特别是当天盲从蒯氏命令、打死打伤工人从而被追责、连累后半生的同学，对此尤难释怀。五十年过去，不但蒯大富们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一向严谨的史家如秦晖先生，也怀疑此乃毛氏阴谋、故意给老蒯挖坑。事出蹊跷，难怪秦先生的想象大胆，也再次证明面对复杂的历史事件，让非亲历者准确判断其中格局，实在勉为其难。

小谢等当事者的回忆说明，不打招呼既非疏忽、更非阴谋，而是事件策划时刻意为之的重要一环。认为出其不意可以防止包括黑手、派性在内的各种干扰，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更为迅捷有利，所以层层布置时就要求保密，不让清华方面知道，“知道了不好办”。然而事实证明此举失当，是导致蒯大富们顽强抵抗的重要原因。所以面对嚎啕大哭、埋怨为什么不打招呼的蒯大富，毛也意识到不打招呼的失误，颇为尴尬，只好含糊其辞，用一句“招呼其实也是打了的”搪塞过去，接着又反诘蒯“414 不也没打招呼？”为之辩解。也许毛历来信奉兵者诡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也许是他以为 414 反文革反江青、这次可能又对抗中央，正是因势利导予以解决的好机会；也不排除对清华和老蒯比较了解的幕僚，出了这么个“馊主意”，等着看老蒯跳进这个坑。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蒯之间缺乏了解和沟通，导致相互严重误判。紫禁城那边想的是，你清华在北京市，让北京市给你打招呼足够了，414 还压根没招呼呢？文革今后要走上逐级指挥的轨道，中央不再直接发话，就从 727 开始。但没想到有中央文革的支持纵容，蒯等骄兵悍将早已不

把北京市放在眼里，北京市的招呼对蒯只是耳旁风。清华园这边蒯想的是，这两年走资派乌纱成打落地，一茬又一茬如同割韭菜，谁知道会不会又有大人物要被抛出来？宣传队要是你老人家派的，看在我忠心耿耿斗王揪刘的份上，怎么也该让江青派人知会我一声。蒯没想到他远未被当成远新、小谢那样的自家人，仍属于“王关戚”之流说烹就烹的走狗。紫禁城那边觉得蒯应该明白，在北京搞这么大的行动，我不点头谁敢？周不是说过在北京调一个排的兵也要经毛批准，谢富治不是说在北京开一万人的会也要中央点头吗？你蒯大富怎么会这点政治常识都没有？蒯却以为，文革兵荒马乱，一切皆有可能。“百万雄师”在武汉不是还把你老人家包围了吗？前不久你们不是还在说“杨、余、傅”有黑后台吗？这两年我们在北京不是动不动就搞数万人的行动吗？紫禁城那边想的是，最近中央接二连三出布告、发通令，你们应该领会中央制止武斗，要“收”的意图。蒯想的是，最近形势异常，是中央斗争激烈的表现，赌一把和宣传队背后的黑手斗，保不齐和两年前反王光美一样，立功的机会又到了。紫禁城那边看清华武斗荒唐可笑不成气候，学生娃娃不至于“真的反了”，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动武。蒯大富却以为，宣传队徒手进校，又无首长露面，似乎没有多大来头，两年前为我平反的，可是周恩来率领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考验井冈山人的关键时刻到了，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争取胜利。727同台演出的两位主角，彼此误解误判如此之深，戏演下去将如何收场，不问可知。总导演气得连连骂道：“你真蠢”！真蠢的家伙除了埋怨为何不打招呼，也只有嚎啕大哭的份了。

对盟友和对手的误判，乃政治和军事博弈之大忌。袁氏称帝，系政治误判的典型。冷战期间，美苏为避免相互误判酿成严重后果，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务实安排。内战时期的中共，得益于卓越的情报工作，对国军动向每能准确判断、多有胜算。然夺取政权之后，在一系列重大政军博弈中，却屡屡误判，每每失算。朝鲜战争前对美国出兵误判；57年整风和民主党派相互误判；培植盟友从地中海明灯到红色高棉一再误判；913之前统帅和副统帅彼此误判；丙辰安排后事对各方势力真实立场的严重误判；后毛时代的己巳年，朝野皆误判酿成灾难；如何防止战略层面的严重误判，也许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所面临的重大

挑战。然而 727 的决策者对于误判及其后果，并没有半点反思和自责，728 接见时的相视而泣，并非为死伤者一掬同情之泪，而是为戏演砸了、事与愿违而难过。一切过错在愚蠢的蒯大富，没人敢说行动安排有失误。最擅长揣摩主公心态、并在其闯祸后为之开脱的，还数林副统帅，一句“损失最小最小”，就把 727 严重失误之“鹿”，硬指为“成绩最大最大”的“马”，俨然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故伎重演。一干与会者随即附和，728 这一幕，也许是进城后凡遇重大失误的常态，怎能不令人掩卷长叹！

文人叙事，每以天气景色描绘为烘托。胡鹏池在其新作《芦花瑟瑟》中，描写瑟瑟芦花，令情感的寄寓、气氛的渲染，更添文学感染力。《清华 727》却疏于写景诚为缺憾。727 当天白昼炎热，下午从科学馆撤出的人群经东西干道东行时，蓬头垢面面色惨白，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傍晚时分天公落泪、入夜一度疾风骤雨，令雨中进退两难的宣传队，处境更加狼狈不堪，上万工人又饥渴寒冷、迟迟得不到明确指令，不时枪声乍起、顿时一片慌乱。子夜开进校园的卫戍区军车上，刺刀在雨夜的灯光照射下闪着寒光……宣传队的领队之一，后来入主清华的迟群，对此情此景应难以忘怀，所以 727 后在清华一次会议上，突然冒出一句：“727 总是要下雨的”。迟群 727 时乃 8341 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他说总是要下雨的另一次 727，应该是十五年前板门店停战签字，时值 7 月 27 日。不知道彼时已经入伍的他，是朝鲜战争的亲历者，还是在清华 727 的雨夜中听触景生情的战友，对十五年前 727 的回忆。

板门店和清华园，相隔十五年的雨水，也许都象征着上苍熄灭战火的悲悯情怀。但点燃无谓战火、令无数生灵涂炭的罪行，并没有得到真诚反思和清算。为了狭隘的利益、虚妄的理想，以革命等形形色色貌似美好的名义，视愚民为草芥、驱使其争斗杀戮的悲剧，至今仍在这个星球上不断上演。本书作者以古稀之年，写就《清华 727》，是期盼未来的人们，不再重演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悲剧、不再遭受我们曾经的苦难。

让 727 的雨水，将邪恶的战火永远熄灭。

727 总是要下雨的，未来的 727，还会下雨吗？■

【专稿】

播种有生命力的思想

《清华七二七事件》不结束语

胡鹏池 但榮¹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我们的这本书也只能暂时写到这里了。但是作为“人”，作为这样一代的中国人，作为这样一代的“清华人”，我们的反思远远没有结束，也无法结束。

社会学学者用三种比喻表述“人”的概念：

人就是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的两足动物。

地球上有193种猿类与猴类，即灵长类，其中192种有毛，一种没毛，自称人类。

人就是一根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草。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能够思想。

相信所有的人都会认同这三种比喻，所有的人都会赞许第三种。

但是，人类自己却常常这样喟叹人生的短暂：人生如梦！

但是，人类自己却常常这样喟叹人生的卑微？人生如蚁！

蚂蚁也是社会性、群居性的动物，它们也成功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但是，动物学家的研究告诉人类，蚂蚁是没有智慧的，他们的生存技能完全依赖于基因传承的本能。

所以，那些有权势的傲慢的人类个体经常对他的敌人或假想的敌人这样说：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

以下内容是一篇根据校友网2015年8月26日至31日胡鹏池开设的话题《请看，清华

¹ 本文及《清华七二七事件》一书的作者之一，清华大学工学硕士但榮先生，不幸于2017年12月13日11时55分在广州病逝。本刊又失去一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友人，悲乎痛哉！

同学是如何迫害清华同学的！》的整理稿。除了对一些可能不宜公开姓名的校友名字作了“XXX”的处理外，基本上是原文无间断、无修改的录入。

就在这个话题结束后的一周，堂堂清华大学校友网也像一只蚂蚁一样被碾死了（风沙了），不过风沙的原因大概与本话题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个话题就成了校友网上最后的一根“思想草”。

一、最后一棵“思想草”

——校友网话题《清华同学是如何迫害清华同学的？》整理稿

1 楼 胡鹏池：转载：谢引麟《今天，我的心还在滴着血！》2015-08-26

即本书第3-05章中《我在清华“渣滓洞”95天》

2 楼：王大定

武斗时，同学抓同学，同学打同学，对阵刺伤刺死同学，开枪打死同学，这都是犯罪！而文革开始整蒯派，不仅是工作组干的，同学中积极分子不是个别的。再追到反右以及各次运动中，人整人，同学整同学，这都是迫害。愿迫害不再重演。

3 楼：顾玉华

请问谢引麟同学现在住在哪个城市？看了文章很心痛。我的一个亲属关牛棚，挨斗，酷刑和她说的差不多，但那都是单位里工人干的，没多少文化。这里打手都是大学生啊！

4 楼 胡鹏池

谢同学在美国。我也是最近（从唐金鹤《倒下的英才》中）才发现这篇文章。从前对

蒯大富制造的“罗文李饶反党集团”、“沈一罗文李饶反党集团”、“十二人反党集团”，只知道名字，也知道刘承娴老师的受辱自杀、饶慰慈老师被打烂了半个屁股，其它的一无所知。看了这篇忆文才略略知道其残酷性。

5 楼 顾玉华：不管怎么说，整人、打人的，都不是好人！

6 楼 杨日胜

在清华时就听说过，有一个物七的打人特别厉害，但是，一直不知道是谁？看了此文后，才知道叫王 XX（注：原帖是点了全名的）。打人这样狠毒，是不能简单地以“派性”来辩解的。

7 楼 马凯梅

看了谢同学的回忆，也就不难理解当年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是何以生成的了，真是令人发指！

8 楼 高晋占：如此打人的暴徒，还有人性吗？还是人吗？

9 楼 胡鹏池

我也这样想。什么叫法西斯？其实这就是法西斯。也许不要一棍子打死说他们是法西斯分子，但至少可以说他们的行为是法西斯行为！

10 楼 XXX：谁有王 XX 照片？将其示众。

11 楼 胡鹏池

千万不能！我们既不是法庭，也不是道德法庭！我们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反思，要顾忌的方面很多。

12 楼 王文中

支持鹏池兄的看法。说出自己的冤屈，揭露人性某些方面的丑陋，不是为了报复某人、某派，而是为了弄清造成这些丧尽人性原因、根源，让这荒唐岁月不再有产生的土壤。

其实这种同胞相残之事，将“清华同学”换成“工人、农民、革命党人等等”，其具体事例要有多少有多少，换成德国人、苏联人、日本人、柬埔寨人、阿拉伯人——也都差不多，关键是在某种邪恶理论的蛊惑下，再善良的人也会变成吃人的魔鬼。

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伊斯兰极端势力控制下的阿拉伯人——

以革命名义杀人、放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

13 楼 王嵩梅

“一个彪形大汉打手。这家伙嘴上叼着香烟，手持大棍，就往我的身上、手上猛打，还抽我的耳光，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他一边还威胁道：‘我告诉你，我们不是吃素的，你是嫌这么站着太舒服了？那我先给你尝点滋味。告诉你，这回我拿这根棒子，下回就该拿那根粗的了。’就是这个凶恶的打手，经常用拳头打我的乳房，用腿踢我的下身。这个暴徒还把我当成靶子，挥动着他的手臂，然后憋足了劲把垒球朝着我身上扔。更可恶的是，他多次把我逼到墙角，然后，在墙角把我往死里打。他满脸横肉，三角眼睛瞪得象铜铃一样大，核桃般的黑眼珠闪着凶光，一步步地逼近我，长时间地恐吓我。我就象一只在恶狼面前无助的小羊羔，哆哆嗦嗦地往后退，退到墙角，再也无路可退了，只好用双手蒙住了我的脸，好几次我感到他的鼻子几乎要碰到我的脸；接着就是例行的拳打脚踢。”—— 这人是谁？

14 楼 王嵩梅

引用回复：支持鹏池兄的看法。说出自己的冤屈，揭露人性某些方面的丑陋，不是为了报复某人、某派，而是为了弄清造成这些丧尽人性原因、根源，让这荒唐岁月不再有产生的土壤。-----

我同意。但这些打手无论如何归因于受蒙蔽，也应该站出来对这些受害的同学道一声歉，反思一下自己当时的作为。有人这样做嘛？我没听说过。

15 楼 王克斌

我在南昌串联时认识张琴心大姐，好像是学生干部。打人整人都不对，制度唆使。要是没有毛主席发动文革，大家都会在努力学习。王 XX 的名字好像在那张表上。列出了许多有问题的清华同学。包括往科学馆开枪的。告别革命就是暴动，告别阶级斗争。

16 楼 王文中

嵩梅：

我不认识王 XX，他当年的作为实在太令人厌恶了，不管人们如何咒骂也不过分。

不过我估计他也应该受到他应有的惩罚，就象老蒯一样。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想这一页也该翻过去了。

我曾拿起长矛，拼杀中刺倒过同学，要说就是个“恶人”，我在校友网曾向那位不认识的校友书面道歉，除此以外我就不知该做什么了。

我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这位兄弟，当面向他道歉，作为补偿，陪他观潮游西湖

我也曾赤手空拳，被对方用铁棍打破脑袋，我也是受害者，不过当时两派打得不可开交，我根本没有想到要对方道歉，因为双方都在“保卫毛主席嘛”！

大定说刺伤刺死对方都是犯罪，不过我当时以为是为革命路线，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地在为理想奋斗，没有想到是犯罪。相反，后来脱离武斗，跑回老家，倒反而有点犯罪感，因为做了“革命的逃兵”。

当年没有参加武斗的同学，当然是高瞻远瞩的明智之举，值得称道。

不过对那些为自己的信念，卷入武斗，坚持到最后的同学，无论哪派，我对他们的精神和意志还是深感敬佩的。尽管他们都是受蒙蔽者，但他们是自己信念的践行者，就此点而言，我是有愧于他们的。

17 楼 胡鹏池

请大家看仔细了。原文是：“后来，有人告诉我，工物系的王子×也是打手之一。（指工物系物701班的XXX。他不仅仅是打手之一，还整理过罗文李饶项目组那些靠逼供、毒打得到的材料——作者注）”。

谢的原文明确地告诉我们“王子X”是打手之一，不是唯一打手。

谢文中明确指出有两帮人。两帮人是多少人，不是一两个，至少也是三、四个。

因为该书是公开出版物，所以我才敢将此摘录于校友网区。

至于哪个彪形大汉究竟是谁？也许谢引麟是知道的，但善意地隐匿了他的名字；也许谢本身也不知道。

18 楼 王嵩梅

文中兄，我倒是认识WZY，67年5、6月间社会调查组调查学部潘梓年、吴传启，成员在骑河楼集中，我那时正在班上闲着，就被乒乓球队的邵启龙介绍进去，那时潘、吴已是“死狗”，而且我们也接触不到潘、吴，调查进行不下去，7月就解散了。WZY是调查组的头，从那以后近半个世纪，我都没见过他。幸运的是我66年9月就从代表队搬回了班上，除了在骑河楼那一、二个月外，没有和代表队一起活动，否则也可能会随一些球类队员进入罗文李饶专案组，在那样的氛围下，我会不会也成为打手的帮凶？很难说。后来听说WZY

搞了个私人企业，好像还挺成功，这么多年来代表队活动中我从没见到过他。

谢引麟文章中描述的是一个赤手空拳的柔弱女同学被一群人暴打、蹂躏、虐待，这尤其令人气愤，在那样的群体环境中诱发出来的个人行为除了受蒙蔽外，应该还有个人性格、思想的诱因。你在武斗中捅伤人并被别人弄伤，那是在你死我活的武斗战场上，这有很大不同，可以用双方都是受蒙蔽解释，你后来退出武斗回家，在当时被认为是胆小鬼，但后来却表明是你摆脱了蒙蔽，尽管你当时也不是想得很明白。

我武斗时一直在6号楼，直到727从6号楼冲出去撤退到北航。参加过守楼，在机械厂加工手枪部件的机加工等工作，530时坐在摩托车的车斗里到化学馆拉过燃烧瓶…

19 楼 刘守昭

无论如何，教唆犯与打手的罪孽远不是一个量级可以同日而语的，这个普世常识还需要共识吗？也是无论如何，1楼的话题和所有跟帖，都有警世意义。例如，到了8964时，再弄四五运动时的工人棒子队就不管用了，因为没有工人愿意再充当打手了。我在工厂里认识的所有工人，都很不齿于打手的劣行，以至于打手后来都“顺利”调走了，因为在原单位臭名远扬实在待不下去了。更也许，单位领导也害怕打手遭到报复报应而出事——坏人胆敢打好人，等时候一到，好人就不敢打坏人吗？！谁也说不准！

20 楼 胡鹏池

我颇认同嵩梅的这个观点：“那是在你死我活的武斗战场上，这有很大不同”。

即使同样做的是坏事，在层次上很大的差别。比如卖假酒，用工业酒精兑酒就是一个层次，用食用酒精又是一个层次，用二锅头冒充茅台也是一个层次。卖假烟假酒是一个层次，卖假种子的又是一个层次；出卖科学的又是一个层次。

打人一拳头与打人几拳头，将人往死里打，用砖头石块，长矛、开枪都是不同的层次。

在两军相逢的武斗战场上捅长矛是一个层次；在没有硝烟的专案组残酷迫害人又是不

同的层次。而且是在长达 92 天的时间内，不断地重复残酷的手段，不断地使用更残酷的手段，这样的人在当年的文革中固然有，但在清华却还不是很多的，就是那么数得清的几个人。

21 楼孙怒涛

有个问题很纠结：

XXX 是个凶残的打人凶手。这样的人，可不可以、应不应该在清华文革的史书上留下恶名？

有些人认为不应该公开他们的名字，因为这样会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他们确实害过人。但后来，他们在清查 516 中被整，在清理三种人中被记录在案，他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现在如果把他们的大名公开，重提他们做过的坏事，那是对他们的二次伤害，也是对他们子女的伤害。公开他们的名字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名誉权、姓名权。更何况，文革的罪责在上层，发动者都没有被清算，对小喽啰更不应该过于严苛。

有些人认为可以也应该公开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劣行已经超越了人性的底线。公开他们的名字，主要目的在于警戒后人：凡作恶者就得付出恶名传世的代价！对于一个无神论的社会，唯有身后声名可能是人们唯一可敬畏的。

22 楼 王文中

老孙：关键是人性的底线是一条很难界定的底线，由谁来定义这条界线？

否则谁都可以以“超越底线”“人肉”别人，自己也可能被人“人肉”，这根底线还是交给法律裁定，否则社会不会安定。

因此，我是主张回忆过去，追求真相，恢复历史真面目，追求肇事的根源，尽量对事件原因进行分析，而不是针对某些个人的人品素质进行谴责和声讨。尤其他们当时也都是些涉事不深的年轻人，是那荒唐的领袖、荒唐的革命理论，荒唐的年代，将他们，也包

括我们自己引入了歧途。将我们一些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罪行，现已恢复自由身的普通校友，定在历史的黑名单中，其实有点本末倒置，会搅乱厘清历史真相的过程。一孔之见，欢迎批评。

23 楼 王克斌

物八的我认识几个，但没见过王 XX。令我诧异的是，那张表里还有物八孙 XX 的名字，我知道他，但不知道文革的经历。这些人已经遭到惩罚，有的还蹲过监狱。连我这个没打过人的人都被整得要寻短见。这批人都 70 岁了，也知道自己的罪过，有不少人开始小心做人。人的阴暗一面在大气候下会暴露出来，关键还是总结经验，停止文革，停止阶级斗争。否则，即使让这些人重新判刑，斗倒斗臭，也无济于事。他们的红司令不是还在水晶棺中受人瞻仰，应当找他算帐去。枪毙几个误入歧途的凶手杜绝不了惨剧再生。总之他们不是好人，但根子不在他们。猫说了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毛远新杀过多少人，现在不是还挺神气的。要斗，也得先斗他。因为文革打人或挨打的青年学生都是受害者，只不过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主动的需要担当责任，自我反省。被动的总结教训，制止文革。把仇恨集中到始作俑者。

24 楼 胡鹏池

我主张用符号或化名来代替

老孙的纠结也是许多人共同的纠结。

如此凶残的打人凶手，他的行为是触犯了法律的，无论是文革前的法律，还是文革后的法律。但问题是文革中已经砸烂公检法，事实上无法可依。但是文革中也曾规定不得私设公堂，然而这是很微弱的声音。

在德国对法西斯匪徒的追索不受追诉期的限制，在中国是有 20 年的追诉期的。无论在

文革中如何作恶，他们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追诉期了。无论他们有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法律已经没有理由对他们再惩处，而道德永远是个软指标。

我们的目的是借人说事，而不是借事说人。

无论这种人现在的心态如何，我们已经干涉不着。我们希望看到他们有深刻的忏悔、真诚的道歉，但没有，我们也无可奈何。

所以我倾向于不作指名道姓的谴责。我们可以说王子 X，王 XX，或干脆 XXX，或用其它的化名，比如姓王的不妨就叫“大不溜先生”，姓孙的不妨就叫团 S、四 S，（纯粹开玩笑）总之不要用真名，以免伤害到他们无辜的家人。

25 楼 高晋占

打破人性底线的恶行，应该永远受谴责。否则，人心不会向善的方向净化。人性的底线很难界定吗？人与兽壁垒分明。

现实是，那些犯过恶行的人们，几十年来鲜有公开忏悔和道歉者，包括打死卞校长者，给朱令投毒者。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看来有道理。

26 楼 周济生

很痛苦地看完了谢引麟同学落难回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事发生在清华园，其残忍程度堪比渣滓洞、白公馆！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对一个女同学如此施暴，这是清华男人的奇耻大辱！

人性丑恶、罪恶的一面，在丑恶、罪恶的环境里会制造出无数暴虐事件。今天反思文革，这些当年最丑恶、最罪恶的一群人，也许已经重新作了包装，或包装成文革的受害者，或包装成先知先觉的思想引领者，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正在侈谈仁义道德平等博爱！

反思文革，如果能把自己放进去一起反思，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27 楼 陆元吉

关于文革暴行：几个没想明白的问题

文革中的有些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其中就有关于文革中的暴行问题。中学红卫兵殴打、虐杀老师和所谓的“五类分子”；湖南道县、北京大兴等地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全国各地武斗中的故意杀人事件。而离我们最近的是发生在清华园里的暴行，如所谓的罗文李饶、十二人集团、和对钱平华等人的蓄意枪杀……。

为什么他们能毫无顾忌地用最残暴的手段折磨甚至杀害他人，包括自己的老师或同学，却毫不自责？为什么在文革中会发生如此规模的暴行？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人性坍塌？如果说前者只是心智尚未成熟的中学生和未受教育而导致文化缺失的农民。但清华园里的大学生（有些还是高年级学生）为何也这么容易地就丢失人性，做出禽兽不如的事？想不通的还有：直接施暴者的人数也许很少，但如果加上现场的参与者、支持者及默认者，其数量将成倍增加，虽然性质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将使问题变得更加沉重。难道人性中的善良真的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当然也会联想到：这几十年来人性有没有改善？如果再来一次类文革，还会出现那么多丧失人性的事吗？但只要看一看社会上充斥的乖暴之气，答案几乎没有悬念。当然施暴对象会发生变化，如被指认的贪官、“卖国贼”或其它人。只要法治社会不能建立，民主宪政没有实现，人性的改善仍然只是空想。

另一个没想明白的问题是：对未被法律制裁的文革施暴者、凶手该不该追索？对已受法律制裁的该不该原谅？犹太人对实施屠杀的纳粹分子紧追不舍，哪怕已事隔几十年、哪怕远在天涯。但据我所知，文革中不少施暴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并未受到制裁，有的还飞黄腾达、颇为显赫。这明显是对恶人的放纵，对受害者的不公。有的已受法律制裁，但未见任何悔意和对受害者的真诚道歉，对这些人我们应该原谅吗？

28 楼 顾玉华

关于枪杀钱平华，那是在 kuai 的思想指导下的，他说：几个人同时开枪，就查不出凶手，谁都不受惩罚（大意）。残酷拷打谢同学，打手们是刻意的，挖空心思地施暴，没有人逼他们，不是不得已。受害者终身的创伤，任何时候都可以控诉！那还叫人？

29 楼 XXX

要追究文革打人，恐怕老蒯和沈老大，都脱不了爪爪，到此为吧。

难道，要工作组或者工宣队又一次登上上层建筑的舞台吗。

我不是替两边打人的说话。文革中本人没打过谁，也没打过别人，可能说风凉话了。

真要追责，夹边沟惨案的负责人以致上推到反右的负责人，大跃进饿死上千万的总的责任人，文革发动者，最好追究这些罪恶最大的人。

这里，有人敢做？我敢打赌，恐怕没人敢做吧。

30 楼 胡鹏池

XX 老弟：真是菩萨心肠。自己不打人，当然是好的；是不是也见不得别人打人呢？不知道；也见不得别人说打人的事，这都让人感到很奇怪！别人能否响应你的“到此为止”的号召？但我不会。

大概又一次让你失望了。

31 楼 宗有方

我认识 XXX，但不熟悉。1970 年他分配到山西阳泉矿务局，可见也是受了清华文革中事情的影响。他的爱人严 XX，到我和俞一中所在的无线电厂工作。经俞介绍我认识了王 XX。因为不知道他在清华做的事，对工物系 7 字班的学长，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没过几年，他夫妻就一起离开了阳泉。以后就没有联系了。本社区曾有文章说到多名校友资助武斗致

残的同学十几年的故事，其中就有王 XX 夫妇。我赞同鹏池和文中的看法，不宜简单地追究作为一个大学生在文革中的责任，但愿他们能在醒悟中度过余生。

32 楼 胡鹏池

有家有国有清华

一楼的帖子是我贴的，因为我深深地为这篇回忆文章所感动。

自从加入这个社区，很多校友的文章令我感动。印象特别深刻的：

第一篇就是范雨臣的《游走于两国间的求医经历》；

第二篇就是高晋占的《想起那年回家过年》。

第三篇就是这一篇了。

这三篇文章组合了一个主题，就是：“有家有国有清华”。

看了范的文章后，我们热爱的国家原来这么差，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机构原来对他的人民是如此的冷漠；

看了高的文章后，使我大开眼界。我家六口人，十几年间仅靠父母工资 56 元养活着；认识但燊，他家也是六口人，每月收入只有 28 元，助学金还只有我的一半（我的助学金 17.5，他的助学金只有 8.5）他就要比我穷很多，而高的家就更穷苦。穷苦得超出我的想象，然而确是真实存在过。

看了谢引麟的文章后，才知道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清华竟然有这样禽兽不如的校友。

不要以为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能解释得通，大家都在捍卫毛路线，可是这样的人在一千个人中也是个位数。

不要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算在文革发起者头上，固然文革造就了这种人，但这种人也造就了文革。文革给了这种人机会，但没有文革，这种人迟早也会表现。

我贴这篇文章，从来就没有想过追究这个人的责任。这种人死也好，活也好，变好了

也好，没有变好也好，与我们关系并不大。我贴这篇文章是为了反思社会，反思清华，反思周围，也包括反思自己。

33 楼 胡鹏池

关于“人性的底线”

在欺骗面前，我们也许会迷惑；在暴力面前，我们也许会软弱；在潮流之中，我们也许会身不由己；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守住人性的底线。

许多人都认同“人性的底线”，XX说：问题是人性的底线是很难定的。我也认同。

的确，人性的底线是很难定的；

的确，人性的底线各有各的标准。

但是，首先要问的是有没有人性的底线？有哪一个人敢说他没有？有哪一个敢说他不人，他是没有人性底线的？

其次，虽然各有不同，但世俗就有世俗的标准。

俗话说：盗亦有道。坏人做坏事也是有底线的。

比如有人小偷小摸习惯了，不以此为底线，行！那么入室抢劫呢？杀人越货呢？谋财害命呢？总也得有个底线吧。

如果什么底线都没有，那他就是畜生。 2015-08-28

34 楼 王 XX

人当然要有底线，在法治社会对底线要有个公认的操作方式，那就是法律。

否则会有各式各样的底线，处于不同时期、不同处境、不同场合，他们的底线也会不断的变化。

自己的底线可以根据自己的感情、直觉给以设定，但不能强求他人认同。

对于底线的性质、程度——各人的看法差异就太多了，因此在处理此类事件时，会引起太多不必要的争议。

起码在校友社区在是否应公示某些校友姓名时，就会有很大分歧。

例如我自己，曾拿起长矛刺向素不相识的同学，现在看来，这哪里还有一点清华学生的底线？我完全有理由被挂上清华校友黑名单。

照此类推，凡是上过武斗现场，拿过武器的所有校友，都应该归于黑名单，不管他们是哪派，起码拿着武器，相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学。拿现在的年轻人来看我们，他们会问：

“你们还是人吗？”

人都是有两面性的，分析一下自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向曼德拉学习，这是我的想法。我会响应 XX 兄的建议，彼此说出自己想法，此话题就此打住。

35 楼 XXX

值得注意的是挨整的自杀的多是平民子弟。至于官宦子女打人杀人后。继续平步青云。这些中学老红卫兵的残忍几乎与派性无关。要算账，也少不了他们。纳粹完蛋几十年了，还有漏网的被重新逮捕、判刑。是否可以要求中纪委设个三种人分局，重新把这些造反派再抓一回，筛选一回，把出国逃避的也引渡回来，让蒯大富等人再续 10 几年徒刑。不知道这样做可以让多少人临老再高兴一回？这些人难道比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更可恨？

2015-08-29

36 楼 陆元吉

文革的话题很沉重，但却无法回避，文革不仅对我们这代人刻骨铭心，而且必定会影响以后的很多代人。现在，对文革的认识还存在很大分歧（从彻底否定到基本肯定）；文革的影响远未彻底清除；对文革内涵的挖掘更只是刚刚开始。从总体上看，对文革的研究和认知恐怕还处在初级阶段。

我们都是文革的参与者，几乎每个人（我当然也在内）的认知和行为都出过很大问题。但问题有不同的性质，多数人需要作的是对认知的清理、反思以及对不良行为的反省，对有意或无意中伤害过的人有一份真诚的歉意。文革是个特殊时期，违法之事数不胜数，对轻微违法，甚至一般违法确实不必追究，但对那些完全丧失人性、以非人手段严重侵害他人（恶性犯罪）的极少数人，在他们没有真诚忏悔和道歉之前，决不应轻言宽容，这不仅关系到法律和正义的彰显也关系到人性的复归和道德的重建。我们在顾忌加害人及其亲人、子女感受的同时，难道不应该体会受害人及其亲人、子女的感情？难道不需要还他们一个公道？我们更需要给当代和后代的人们提供一些人性如何扭曲和丧失的实例。这是我们民族自我救赎的重要部分。2015-08-29

37 楼 胡鹏池

再谈关于“人性底线”

1、人性底线与法律是两回事。“触犯法律”并不等于“超越了人性底线”；同样“超越人性底线”也并不等于“触犯法律”。两者完全不能划等号，当然也有联系。

2、人类社会对“人性底线”是有共识的，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问题也有差别。

阿拉伯国家认为三妻四妾很正常，中国人有二奶、三奶是婚姻法所不允许的。但是在中国普通百姓群中这也不能算是超越底线，但在官场上，是超越了中国当代官场的底线。

美国社会的公民持枪既不触犯法律，也不超越“人性底线”；中国社会的公民持枪既触犯法律，也超越“人性底线”；

但美国公民持枪杀害无辜，不仅触犯法律，也超越了人性底线。

文革时两派武斗局面形成，参与者拿了长矛可以认为没有超越人性底线，但主动进攻，刺死刺伤了人，不仅触犯法律也超越了“人性底线”，但情节仍然有轻重之分。

3、人类个体一般也以人类社会的关于“人类底线”的共识为对自己的要求，但在许多问题上个体有个体的标准。

比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就是一条底线。但是人若犯我呢？有的人的底线就是“人若犯了我，我也不犯人”。当然这里又有一个程度的问题。能不能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作为一条底线呢？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有的人还要再加上“一犯到底”。

我的观点是：凡人都会有人类底线。是否“超越人类底线”是一个自我觉悟、自我约束的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不要以为法律没有规定就可以认为没有这个概念。

曼德拉以宽容化解民族矛盾，我们也要以宽容化解社会矛盾。这当然是对的，但宽容绝不等于没原则、没是非，没界限。

38 楼 高晋占

谢引麟被迫害的事，在文革中就听说过。今日读她的回忆，依然触目惊心。她曾经是我们的领导机构——文艺社团团部成员，是一位佼佼者，也是一位弱女子，遭受如此暴行和虐待，身心的创伤可想而知。

39 楼胡鹏池

XX兄：让蒯大富再续10几年，你以为能让多少人临老再高兴一回吗？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就我而言，我最高兴的事之一还是看到包括克斌在内的校友写出像《文革产生的社会条件与民众基础》这样的好文章。

40 楼胡鹏池

我们更需要另一种弥补与忏悔

就这个社区的绝大多数校友而言，我们都不是受害者，我们也不是迫害者，但我们更

不是冷眼旁观者。

四十多年来，我们不知道在清华竟然发生过这样的事，相信许多校友也与我一样第一次如此详细的知道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事。

我们的确是少见多怪的，所以我们无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多见不怪，摆出一副冷面孔，显示一副冷心肠。

我们做不到。

我们固然需要迫害者迟到的、真诚的道歉与忏悔，但我们更需要校友群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另一种弥补与忏悔。

珍惜别人的苦难，就是在为自己灵魂寻找居所；

追寻这样的苦难，不但可以抚慰受害人与更多人难以弥合的创口，减轻他们的痛苦，也是在求证我们没有失忆，没有丧失人性底线的事实。也是证明清华人不是白当的，也是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我们要告诉受害者，也告诉过去的清华人与现在的清华人，告诉全社会，我们都是谴责迫害者的，不以任何借口为这种迫害行为所辩护，我们会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清华人不是高学历的野蛮人，清华人不是高智商、高知识、高技术、缺文化、缺人性、缺良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2015-08-30

41 楼 阎淮

天天学习社区，尽管日日不语； 楼上诸多好友，高见似乎相异。

可能有所得罪，在下事先作揖； 拥护胡兄鹏池，此刻表态必须。

无论暴君独裁，尽管极权专制；我们

可以神马都没有，但必须有一——良知！

可以神马都不要，但必须要——人性、人道、人权！

可以神马都不是，我们必须是——摆脱了兽性的人！ 2015-08-30

42 楼高晋占：鹏池兄 40 楼说得好，赞一个！

43 楼 胡鹏池

一位清华同学的继母当年在贵州的息峰集中营呆过，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她所描写的贵州息峰集中营的酷刑比“十二人反党集团专案组”遭遇的酷刑差远啦！

听说蒯大富曾经几次要求去向饶慰慈老师道歉，都被饶老师和她的家人拒绝了。这说明老蒯也许认识到他真正的犯罪行为是迫害了这些老师与同学们。

44 楼胡鹏池：谢谢老淮，因为珍贵，更要谢谢。

45 楼王嵩梅：当年饶慰慈专案组的头头和成员去道过歉吗？他们站出来过吗？

46 楼周忠荣

完全赞同阎淮兄 41 楼所言。我是每天至少早晚两次来社区学习的，但很少发言。谢引麟的回忆文章（1 楼）我早就看过（在《倒下的英才》一书中），每看一次都心酸。借这个场所，我想问：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何以有人所作所为越过做人的底线，伤尽天良？

47 楼 胡鹏池摘录：自投罗网的饶慰慈老师被打掉半个屁股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的第四号人物饶慰慈老师，被老团的打手们，用钉上长钉子的木头棒子痛打，她的屁股被打烂了，只剩半个屁股。两年后清华到江西鲤鱼洲办农场，工宣队竟然让饶老师去了鲤鱼洲。由于她的屁股被打坏了，她只能跪在地上干活。饶老师的身心和肉体都被严重伤害，只要一提起那段可怕的经历，她就浑身颤抖，不能自己。在她生前，我不敢向她了解那一段时间的事情。饶老师是被老团的打手用钉上钉子的大木头

棒子活生生打残的！

48 楼胡鹏池：转载饶慰慈女儿的血泪回忆 2015-08-31

49 楼宗有方

还原和揭露真相是知情者和过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50 楼胡鹏池

迫害谢引麟的显然与迫害饶慰慈的不是同一拨人马，那一拨人马的手段以罚站为主要特色，这一拨人马以打屁股为特色。

把饶老师半个屁股打没了，这是何等的凶残。

51 楼胡鹏池

饶慰慈老师为什么不肯屈打成招，苟且偷生？

在如此残酷的迫害下，很多人会选择屈打成招，以求得暂时苟且偷生，但是饶老师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

她的女儿说：记得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问她：如果当时你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承认了他们让你承认的事情，是不是就能免受这样的皮肉之苦？

母亲回答说：那时如果承认了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就是打死了你也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我不能那样死得不明不白。

母亲反问女儿：一个人怎么能承认完全没有的事情呢？

母亲又说：他们除了让我认罪以外，还要让我去揭发检举别人，我怎么能为了自己而诬陷连累其它无辜的人呢？

看着母亲，女儿哑口无言。母亲几乎用自己的性命告诉了女儿做人的底线。

在这里，饶老师有两种回答。

第一种回答是看透了事件的本质，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

第二种回答更为高尚。

事实上无论在“十二人反党集团案”与“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都有人屈打成招，认罪招供。也有人攀咬了别人。

也许我们真没有资格去进一步地指责，你为什么不能坚贞不屈？

这个伤疤我们不能揭。

这才是我们要充分理解、充分原谅、充分保护的。

但比较起来，饶老师做人的层次更高一等。

52 楼胡鹏池

我认同这样的结论

昨天有一位校友告诉我，在校友微信群里有一位校友这样说：

“为使领袖脱罪而把一切坏事推给下面，那是卑鄙；为证杀人凶手无罪而归于上面唆使，那是无耻。”

说得太好了。我认为这条微信可以能成为我们所讨论的话题的一个结论，可以成为我们的共识。

我不知道对于这个结论有人反对吗？反对者请陈述理由，我们继续讨论。

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至此辄然而止。类似的话题、类似的立场与观点，后来在相关的微信群中不断地重复出现。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胡鹏池 但榮 2017-3-10

二、几根“思想草”

（一）唐金鹤《倒下的英才》第三版自序

2014年冬，唐金鹤在《倒下的英才》全新第三版作者序中写道：

“艾森豪威尔将军曾指示，对纳粹当年的大屠杀，要尽可能搜集证据、影片、证词，以免有一天有一些狗娘养的说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同样地，我们也要留下尽可能多的证词与照片，对文革的罪恶，对极左路线的罪恶，进行毫不留情地揭露；以免有一天有一些狗娘养的说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我们记录下发生在清华园里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去扬名；更不是为了迎合市场口味去挣钱。作为人类，我们有义务出声，去揭露、去谴责那个时代的一切反人类的暴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我们追求真实的历史，不是为了记下仇恨；而是在搞清真相之后，我们用以善为本、以爱为先的原则，来弄清是非对错，并大白于天下。在施恶者认错、悔改的条件下，才可以谈宽恕。”

“但现在有些人不讲事实，不理是非对错，就标榜自己“已经跳出纷争、没有派性”，只有他们“最公正”、“最懂得宽恕”，这使我感到恶心。我认为，不分清是非就讲“公正”，是没有良心。而有些情节与后果恶劣的施暴者不仅不知悔改，反而编造历史，欺骗世人；不清算这些施暴者的罪行，就讲“宽恕”，将埋下暴行复活的种子。”

（二）陆元吉的微信

在文革期间发生的无数悲剧中，有一类是最需要认真反思并永远铭记的，那就是反人性的暴行。这类罪行不同于一般的罪错，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肆意践踏，是对人性的公然挑战。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对这类罪行予以揭露和谴责，而决不能容忍和姑息，也不

可让其在派性掩盖下轻松逃脱。追溯历史是为了警示未来，特别在外部环境仍然恶劣的当下，能否通过对历史的清理，使更多人认识到：漂亮口号下可能隐藏着大恶；不能以任何借口超越人性的底线；人人都有责任抵制反人性的暴行。这才是清理文革中反人性罪行的意义所在。

（三）胡鹏池、但燊的微信

对于陆元吉校友的这个观点，我们极为赞成。我们写“清华 727 事件”的主旨有两点：

第一：揭露红卫兵政权的残暴性与欺骗性；

第二：揭露极少数极端极左造反派的反人类的法西斯暴行。

所以，胡鹏池在微信群代表但燊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认为对清华文革的反思有两个基本前提：

1. 两派都是极左路线的产物，都是错的；
2. 两派群众都是文革错误路线的受害者。

从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往后回顾，往前瞻望，得出唯一的教训、也是最基本的教训：在欺骗面前，我们或许会迷惘；在暴力面前，我们或许会软弱；在潮流之中，我们或许身不由己；但在任何时候，我们绝不能做超出人性底线的事。回顾、反思清华文革的意义最终落脚于此。

几度寒暑，不知不觉，又到了春天播种的季节。农夫播种的是有生命力的种子，思想者播种的是有生命力的思想。■

胡鹏池 但燊识于 2017-3-11

【罗文胡注】



作者简介：

罗征启，1934年出生，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文革前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后任清华大学党委原副书记，1983年任深圳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1985至1989年任深圳大学第二任校长。现为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清华文革亲历记》[注 01]

第一篇：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

——记1966年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罗征启

本篇目录

- 1964年暑假，带队到部队当兵（略）
- 蒯大富初露头角
- 能说会写，是个宣传干部的“料”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批“三家村”，又见蒯大富
- 晴天霹雳，大疯狂开始了
- 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
- 恐怖之夜，血洗清华园
- 左右夹攻，两面不是人

就其混乱、荒唐和残酷的程度而言，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虽然，这场大动乱是1966年6月正式开始的，但奇怪的是，1966年下半年清华的历史，却常常被忽略、被遗忘，似乎这一段什么都没发生，直接进入1967年的两派矛盾和1968年的百日大武斗。这是不真实的。

我想用我在这场动乱中亲身的经历，和我亲眼所见，告诉后来人，这一时期清华大学发生了什么！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未必就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历史，但纪录下来就是对历史的补充或注释，是对历史和自己负责，也是对那些蒙冤的同事负责。

有一点必须说明的，就是在大动乱时，我的每一段经历中，都会伴随出现蒯大富的身影，这是事实。那个年代，清华人都知道，蒯大富是罪大恶极，我本人是身受其害的苦主之一。但是这场大混乱、大灾难不是他蒯大富发动的，而且在1966年下半年，蒯大富基本上没有自由。他是反工作组的“反革命”。[注 02]1966年这一段清华园内发生的一系列“红色恐怖”事件不能要他来负责。

蒯大富初露头角

在文革大动乱以前，没有几个人认识这个“蒯”字。大动乱的一个“功劳”之一就是在大学生中普及了这个字。

我们去部队当兵的那段时间，解放军正在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大比武”。一天，各营、连干部到团部汇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化工系有个连指导员讲：“我连有个战士讲用得挺好，但是他这个姓我不认识。他们告诉我，可我又忘了：草字头下面一个朋友的朋字，右边再一个立刀。”团长和各营、连干部都说不认识。我说：“这个字念kuai。”团长说：“还是你们有学问。”我解释说：“小时候看《三国演义》，里面有个人姓这个字，我查了三次字典才记住。”[注 03]

于是，蒯大富被选中在连、营里讲用。指导员拿他的稿子给我看过。并说他是贫农家

庭出身。他在营里讲用时，我站在后面听了一回，印象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但是他讲的内容我一点都记不得了。

一个多月后，结束当兵生活返校时，是由我和学生干部带队，经小汤山、西北旺一带行军回到清华，很顺利，没有人脚打泡。这一个多月当兵的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

我对这次带队到部队当兵的成绩还比较满意，自觉很有收获。但是几年以后，我才发现，正是从这次当兵“学用”毛主席著作开始，蒯大富这个名字就一直纠缠着我，成为我挥之不去、斥之不散的梦魇。

能说会写，是个宣传干部的“料”

当兵回校以后，我渐渐淡忘了蒯大富。当时，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陆续出了“一评”到“九评”苏共修正主义的文章，我们习惯称之为“九评”，内容早就忘光了。但是，在学习“九评”过程中，蒯大富却又浮出水面。

按照分工，学生的日常思想工作，是由团委负责，宣传部是负责教职工的思想和政治学习的。党委副书记艾知生统管团委和宣传部并兼任宣传部长。当时党委正在抓学习“九评”联系反修防修思想改造的实际。艾知生亲自抓，筛选一批文章，送交宣传部准备登在校刊上。我在宣传部分管校刊。记得党委宣传部有位同事问我：“蒯大富你认识吗？”我说：“我知道这个人，怎么啦？”这位同事说：“这里面有篇蒯大富的文章，写得挺生动，艾知生好评有加。听说你带队当兵时认识这个学生。”

随后，艾知生又问我：你认识蒯大富吗？我回答：“我带队当兵时，知道这个学生。”不知为什么，在我的潜意识里，对蒯大富有一点“需要戒备”的感觉，所以我只说“知道”，不说“认识”。其实在英文里“认识”和“知道”是一个字，但在中国，我觉得涵义有点不一样。

我汇报了当兵时“讲用”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并说：“回校以后，有一次蒯大富忽然

找我，请我审查学生广播台的稿件。说他现在在学生广播台当编辑。按规定，学生广播台的稿件，一向是由团委书记、副书记审的。以前我当团委副书记时也审过。现在我已到党委宣传部工作，审广播稿，不是我份内的事。但蒯大富说团委书记们都不在，所以送党委宣传部审。我打电话证实团委书记都不在，于是代审了这批稿件。这件小事使我知道，此人现在又在广播台当编辑。”艾知生听了，若有所思地说，“此人能说，能写，是个宣传干部的‘料’，你以后注意一下。”

什么是“宣传干部的‘料’”？我自己是吗？在毕业30周年、40周年同班同学聚会时，大多数同学说我走错了路，说：“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建筑师的‘料’，却去了干党政工作！——”在同班同学的印象里，我是个不爱讲话，也从来没写过文章的学建筑的“料”。因为姓罗，年纪较小，个头不大，所以获得一个“小萝卜”的绰号，广东人称之为花名。后来在江西鲤鱼洲农场，因为整天和牛打交道。又因为比较实干，所以又得一花名“骡子”。如果是能说会道，口若悬河的宣传干部的“料”，肯定会获得“叫驴”的花名。此时，我倒觉得蒯大富还真是个宣传干部的“料”。[注04]

但是我并没有去“注意”谁是什么“料”，因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席卷全国的黑色风暴降临了！什么“料”都没用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年，政治形势日益严峻。我感到，清华党委特别紧张。有以下几个迹象：

一是蒋南翔经常深夜回校，召开书记或常委会议，我这一层的干部当然不知道内容。但已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二是从党委副书记艾知生那里，经常放出些令人紧张的信息。如北大“四清”的紧张情况，说北大有的干部乱揭发，乱批判，暗示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如果遇到类似北大“四清”等情况，一定不要乱讲话。

三是一段时期，蒋南翔和艾知生等频频讲解左和右的关系问题。记得一次党委传达蒋南翔的意见说：从一条船的左边掉下水和从右边掉下水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党委的结论是，在蒋南翔的领导下，清华的大方向一贯是正确的，对左的和右的都有一定的抵抗力，对“左”的可能更敏感一点。

四是艾知生召集宣传部、政治课的一批干部研究校内的思想动向，又传达蒋南翔的意见：清华是理工科大学，意识形态上不如北大活跃，问题也不会那么多，但建筑系是最敏感的地方，可能会有些问题。与其将来让人家来查，不如自己先查，有问题自己先解决。决定由我带宣传部、政治课几个人进建筑系，不要说“四清”，也不叫工作组，看看有什么问题。艾知生私下里对我说：“这只是个姿态，你稳住了。真是有什么问题，先个别汇报再说，不要张扬。”我到建筑系蹲了三个月，听梁思成的课，检查了几本教材，和几位老师交谈过，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算交差了。

文革以后，我才知道，任凭蒋南翔多么敏感，多么充分地做了思想准备，也顶多算是大风暴中拣了一顶破草帽，没一点用。而我，则落得个“受党委委托到建筑系搞假‘四清’，包庇和保护‘刘少奇、蒋南翔的忠实走狗黄报青’”[注 05]的罪名，被蒯大富们反复批了多次，直到黄报青先生丧命九泉。

为准备年底12月9日的“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中央指定要蒋南翔到人大大会堂作报告。蒋南翔本来做事很认真，在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指定要蒋南翔到人大大会堂作报告，无异是对他的成绩、地位的充分肯定。他很高兴。于是抽调我和党办的周家愬两人到他家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帮他写稿子。

在讨论改稿件时，或在休息漫谈中，蒋南翔多次谈到左和右的问题。他说：“一二·九运动”当时就应该是反左为主。左的危害很大，因为要抗日，队伍内部就没有右的问题。但要团结和动员更多的人抗日，就要排除左的干扰，他还多次提到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我不懂，也不好问。“抢救运动”对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如同“文化大革命”、“反右”、“反右倾”、“三面红旗”、“肃反”、“批胡风”、“批《武训传》”、“三五反”等

等运动。对于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或是89年“6·4事件”对80后这一代人一样，只是一个抽象的或模糊的概念而已。甚至根本不想知道。但是，难道我们曾亲身经历了“三面红旗”、“反右”、“文革”等运动的这一代人，就很了解这些“黑色风暴”了吗？难道蒋南翔那一代人就真了解“抢救运动”了吗？我当时没问，我相信，问，也不会作答。

蒋南翔作完报告，回到清华，很高兴地对我说：“中央领导的评价是肯定的，认为很好。”但是，我们宣传部收集到的教师、学生的反应是“没有反应”。这是我们的宣传工作普遍的自欺欺人的现象。“没有反应”其实是最坏的反映。“哀莫大于心死”，宣传工作的“哀”莫大于没有反应。这个报告，并没有帮到蒋南翔的忙，反而多了个小辫子，让红卫兵揪斗。

批“三家村”，又见蒯大富

“文化大革命”的序曲，批“三家村”开始了。本来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在上海发动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和邓拓的“三家村”运动。吴、邓都是北京市的领导，所以北京市一直顶着不批。按中央部署由有文科的大学批“海瑞罢官”，而清华就要批“三家村”。一边要求必须批，一边又不愿批，只让清华党委非常为难。

艾知生代表党委向宣传部交代，对内一定要稳住，不要乱批。乱批的结果，是非不清，势必批到自己头上。对外宣传要积极一点，这是个姿态问题：应向外界表明，清华批“三家村”是积极的，而且对外宣传还有报社、杂志社也会帮我们把关，不会出轨太远。最好是在北京的各主要报纸上，三天两头要有清华师生写的批判文章。艾知生说：“罗征启，这事交给你办，你办事稳健，不会过头。”

我知道，清华教师很难动员起来，于是召集校刊《新清华》、学生广播台、学生文艺社团的文艺社等几个宣传系统的学生写作组、通讯员开会，传达了党委的意见。当然，我没有传达“不要乱批，不要过头”等意思，我知道，这些意见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更不能见诸于文字。

接着，大批的稿件送了上来。其中大部分稿件都不能用，都是乱批，或批过头的。我并没有再开会，而是小范围，甚至个别谈话，指出问题。

我总结了几点负面的倾向：一、批“三家村”，不能凡“三家村”的文章，甚至凡邓拓的文章就一定是错的，就一定要批。记得有个学生甚至撰文批邓拓的书法，说邓拓妄想在书法上胜过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些，艾知生称之为“左派”幼稚病，我认为这些连“幼稚病”也算不上，简直是精神病。心里真担心，觉得学校快要失控了。二、有问题的文章也不是字字句句都错，都有问题。批评古人的叫“指桑骂槐”，赞赏古人的叫“借古讽今”。这也难怪，本来“三家村”就没有什么好批的，硬要发动学生群众来批，只能钻牛角尖、用显微镜来找毛病了。三、有问题也要具体分析，什么问题，错在何处。总之，不能对的错的一锅煮，那就没有是非，那就是无政府主义了。更有甚者，有的把一切全颠倒过来，不管对错。错的当然要批，对的，就加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帽子来批，这就叫乱批！

稿件请宣传部的一些同志帮助审，凡属于我说的三种负面倾向的稿件，基本上都送去报社，否则将来学生说宣传部扣押稿件，这个罪名就大了。凡有希望，可以修改的，就找写稿人谈话，指出问题请他们自己改，然后帮他们送去报社。北京各大报，每周都见到有清华学生的文章。文字一般，道理浅显，但是挺热闹。

我开会布置时，没有注意到有蒯大富。但在学生批判文章里，我又见到这个名字。我找他谈了谈，帮他改了一下，他同意了就替他送《光明日报》和《工人日报》。《工人日报》采用了，又大删大改。刊登时只有豆腐块大小，不到二百字。但也算是一篇稿件！后来，我见蒯大富反工作组那个劲头。暗想如果我当时没理睬他的稿件，他肯定会揭批我扣押他大批判的稿件呢！

艾知生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他微笑地说：“就是这样，热热闹闹，表示我们很重视，能动员学生群众，但是又不是胡批乱批，是可以控制的力量。”他见到《工人日报》上刊登的蒯大富的文章，高兴地说：“短了点，简单了点，但是，这样就好。你手上是不是有几个写手，你动员的很快嘛！”

我没有吭气。我没有告诉他，文艺社的一些学生，很有自己的观点，例如党支部书记印甫盛[注 06]就对我说：“我们开夜车看了全部‘三家村’的文章，不但不想批，相反，觉得很棒！”我也没有告诉艾知生，另一个学生万润南[注 07]对我说：“你那三种负面倾向总结得很好，但是，真按你那三条，那就不应该批‘三家村’！”

但是，一切都还来不及思考，来不及分辨正确和错误，一场使中国人陷入空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晴天霹雳，大疯狂开始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台又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直接号召群众起来造反，群众造在任领导的反，学生造老师的反-----。整个北京、中国开锅了！清华的形势，急转直下。眼看整个学校已经失控，不可收拾了，我就跑到党委，想讨点“指示”。领导都不在。只见到艾知生，面色凝重，一反常态，不愿讲话。离开党委办公室的时候，在门口碰见几个、十几个，不，有二、三十个政治辅导员，都问我党委有什么部署。我已经蒙头转向，能说什么呢！

接着，学校在任各级领导干部及一些老师被造反群众抓去、游街，戴高帽，批斗，打人。清华顿时陷入了上丧失理性的歇斯底里“红色恐怖”之中。

我是典型的“清华牌”干部，特点是“听话，出活儿”。在我们的思想里，党和毛主席永远是光荣、正确的，永远不会有错的。毛主席说谁“反党”，我们就打倒谁！我这个人还算是有一点独立思考的，以前历次运动，也曾经有一些怀疑，不理解，但总是能尽量跟上，尽量去理解。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但承认我错了，而且要我承认执行了反动路线！甚至要承认镇压学生运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些话，我怎么也说不出口！57年反右，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阳谋”！吓得我一身冷汗！后来再一想，对付敌人、反动派，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可是建筑系六百多学生中，定了23名“右派分子”，都是我的学生，都是

我签字定案的，难道都是敌人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使我感到内疚和不安。现在，我自己成了革命的对象了，天哪！这怎么可能呢！

说我错了，我想不通，但是还要拼命去想。一身晦气散发不出，于是全身出了许多疙瘩，两个多月后，才逐渐退去。但直至今天，还留有一些疤痕。当时到处抓干部、教师去游街，还要拼命去“理解”，这样反人性的现象怎能去理解呢？

我们同一教工宿舍有位老师，他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因为看我工作忙就要我每天把暖水瓶放在门口，她老人家每天上午给我灌满开水，以便我中午一到家就有热水喝！这大概已有半年多的时间了。这时，另一位教师在楼梯口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是剥削阶级思想作风，让老人家给自己打水！那天，我早晨离家时看到大字报，急忙回去收起暖瓶。中午，老人家提着一壶开水敲我的门流着眼泪说：“罗老师，不要紧，我不怕，你还是把暖瓶拿出来，或者早晨拿到我的房间，中午再拿回来。”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连忙再三鞠躬，但说不出话。我说什么呢？写大字报的老师和我在一个系统工作，人也很好。可是这个世界已经混乱了。我们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夫妻、朋友、师生、父子、祖孙反目为仇，互相检举揭发，甚至打死老师、校长的事，每天都有所听闻。一壶水，算得了什么呢？老人家现在大概不在人世了，但她那慈祥、纯朴、悲哀的眼神，我永远不能忘怀。

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

以前学毛选，看其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为没有联系实际，也没有切身体会，所以并没有在意。现在到处都是游街示众、抄家打人等反人性的、暴力的、恐怖的行为，心想不知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注 08]等到被“革命群众”强制性再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才知道都是从这里学来的。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对这个《考察报告》说个“不”字。所以有人说，再有风吹草动，年轻人还会以这个《考察报告》为理论武器，活学活用，横冲直撞，彻底砸烂前进道路中碰到的一切！

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大约在6月4号以后[注 09]，就失去自由了，每日就等待着群众“提审”、批判、游街示众。接下去又组成劳改队，凌晨四点起身去扫马路，白天在校园里拔草，晚上修大字报棚，不准去看大字报，或参加群众大会。因此对运动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也不想知。

7月底或8月初，全体劳改队人员集中在东大操场。太阳很毒，晒得烫人，我们上午拔草已经很累。一个据说是化工系的小伙子，长得有点像日本人，有人小声说：“皇军的，要训话”。他下令我们跪在发烫的煤渣地上，训了半个多小时。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恢复了工作。一次随着许多教师干部参观200号的反应堆，看见这个学生。他一见我们就向后倒退，几乎跌倒。我们什么都没说，但他很紧张。200号的团委书记说：“这个人还不错，工作积极肯干。”我只说了一句：“不知他对在东大操场上罚几百个教师、干部跪在太阳下有没有点认识，希望不要轻易忘掉。”

8月24下午，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传闻基础课总支书记李卓宝被剃阴阳头。工字厅的干部们听了，个个紧张起来。剃光头还怕，剃阴阳头怎么办？我赶紧跑回宣传部办公室，这里的“革命群众”跟我关系较好，我说明情况，请求他们帮我搞个光头，以免弄个阴阳头。结果，我躲过了这一劫。

晚饭后，通知劳改队集合到二校门劳动。我们马上整队，带上黑帮牌子。这牌子是我先按“革命群众”的要求做了我自己的，大家认为我做得好。还有人说：“还是建筑系的会设计。”结果由我给工字厅劳改队的每个人做了一个。到二校门一看，目瞪口呆。原来二校门已被汽车和拖拉机拉倒，这个清华的象征之一的建筑物已变成一片废墟。[注 10]像照片上的雅典卫城，也像英法联军破坏过的圆明园。但是，现在破坏者正是清华学子，这情景让我们心寒。

还没有缓过神来，周围好几个人已经在下命令了：“快搬！”“搬到机械厂旁边的建筑垃圾堆去！”抬头一看，周围都是围观的群众。从二校门到机械厂旁的垃圾堆，由两边围观的人墙形成一条通道，我们这些“劳改犯”就要双手搬垃圾通过这条大约200米长的

通道。每次搬运估计要 50 斤以上的垃圾，少了就要挨打。两边的人手执木棍或带刺的树枝，搬少了或走慢了，两边的棍棒树枝就会劈头盖脑地打下来。走到一半时，手指和手臂已麻痹没知觉了。垃圾掉落地上，又是一顿打。我想抬头看看打人的都是什么人？大部分不像是清华的人，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无组织的人群是最可怕的，他们没有任何约束，什么都干得出来。而且“法不治众”，即便打死人，还要喊“好得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注 11]

每当我想抬头看看周围的人群时，立即有几根棍子打下来。“看什么看！快干活儿！”但是我还是能认出，这疯狂的人群当中，有几个清华的人，他们甚至能叫出劳改犯的名字：“XXX，你也有今天，快点走！”我不想记住这些人。以后，我也曾经见过这些人，他们像没事似的。

干了大约两个小时，已经精疲力竭，人们常说“汗流浹背”，而我们汗水都流完了。每次搬运那 200 米距离中，砖石块要有四、五次掉在地上，我宁愿挨打，也没有气力多搬了。这时，一位平日带我们“劳改队”拔草、扫地的学校园林队的师傅，站在废墟上高声大叫：“工字厅的干部们，马上在校卫队前集合，快！”校卫队就在二校门的西侧。这位师傅平时慈眉善目，现在也凶起来。集合好以后他立即带我们这些“劳改犯”离开二校门现场。到工字厅前停下来，他又恢复了和善的面孔：“赶快解散，回家休息！”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他是把我们“捞出来”。这也是我们终身难忘的救命恩人哪！队伍解散了，我们有三、四个人晚走一步，对这位师傅说：“谢谢你，师傅！”他说：“别谢我，他们不应该这样对你们的，快回家休息吧！”[注 12]

我回到家。刚从绵阳分校回来没几天的妻子梁鸿文一直在家里提心吊胆地等我。我一进门就瘫坐在床上说：“差点见不着啦！”

我们哪里知道，更大的灾难已经临头了！

恐怖之夜，血洗清华园

8月24日晚上，也许已到次日凌晨了，经过全天超强的惩罚性劳动以后，满身灰土，既没有去洗，也没有躺下，只是呆坐在床上。这时，鸿文忽然惊叫：“听！”远处，令人毛骨悚然的歌声逐渐接近我们住的荷花池一宿舍。“拿起笔，做刀枪，团结起来打黑帮———杀！杀！杀！”[注13]鸿文全身颤抖，想哭但哭不出来。我说：“别紧张。”她说：“怎么办哪？”这时，那支恐怖的队伍已来到窗下，只听得下面大喊：“黑帮分子，出来！接受人民群众的批判！”同时，已有人将一楼的几个教师和干部拉出来，在外面用皮带抽打。

我住在荷花池一宿舍的二楼西头的第二个房间。有几个人从西头的楼梯上来了，一个声音像是向导。经过我的房门时，说：“这里有一个”，又向前走，“这里一个”———，接着房门被踹开了。我想安慰鸿文一下，但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两三个人拉出去了。鸿文见我只穿了件背心，拿了件衣服给我，被他们一把推了回去。我看了看，几个人都不认识，看来像清华附中的学生。那个向导则不见其人，他一定是大学的，因为他对我们宿舍的情况一清二楚。我被抓到外面，有两个人在两边挟持着我，按我跪在地下。接着不知道有多少根皮带劈头盖脑地抽过来。他们嘴里还骂着，好像是说要报仇。要命的是有一根皮带是用有皮带扣的一端来抽。我尽量低下头，避免抽到眼睛。后来我听说，蒋南翔的秘书邵斌就是在乱军之中，被皮带扣抽中一只眼睛而导致失明的。[注14]我没有被抽中眼睛和头部，但头上多处被抽打流血，痛得忍不住叫起来，引来更多更狠的抽打。“让你喊！”打到队伍快过完的时候，我被拉起来推向游行队伍。必须弯腰90度并低头，走慢了或跌倒了都会遭到一顿抽打。这时一个很熟悉的声音问我：“张慕津哪里去了？”我没法看到此人的面孔，只是回答说：“不知道。”张慕津是团委书记，当然是首当其冲的“黑帮分子”！

这支队伍走过了工字厅，在经二教室楼向北转向大礼堂。根据声音判断，这里人声嘈杂，一定很多人。我们这个黑帮队伍，大概有五、六十人，全部被带到阶梯教室，在讲台一面从南到北跪了两排。我在靠南第一排第七、八。这时一个大嗓门喊起来：“黑帮分子

你们听着，今天在北京市，一个红卫兵被地主老财杀了。现在，我们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暴力对付暴力。你们搞阶级报复，我们也要还给你们阶级报复，我们要报仇。你们这些黑帮分子，必须得到报应！”我看不清此人的长相，但听其声一定是非常恐怖的恶相。说完，此人就从北到南，向跪在水泥地上的每个“黑帮”抽一皮带。我也挨了一下。但比起刚才的抽打，这就不算什么了。

在阶梯教室跪了半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被带到隔壁的科学馆二楼，分别跪在走廊两边。我跪在审讯室门口。每隔十来分钟，就要换一个“黑帮分子”带进审讯室。问什么话我也听不清楚，也无心去听。问一会就抽打。皮带下的呻吟声是真实的，不是演电影。

一个声音嚷道：“捉到张慕津了。”原来张慕津和我住同一宿舍也住二楼，我在西头，他靠东。抓“黑帮”的队伍在外面喊“黑帮分子，下来”时有人从西边楼梯上来，他就从东边楼梯下楼，藏在一片绿篱后面。等队伍过去一会，他又回家了。没想到这些“革命群众”又杀了一个回马枪，抓到了他。我估计是有人带路的。

几个人把张慕津架到审讯室。我刚想看一下，就挨了一顿抽打，“不准看”。我就听审讯室里很重的抽打声音和张慕津的呻吟。过了一会一个学生从审讯室里出来，大声说：

“张慕津想逃过群众的专政，被我们抓到了，现在他就要从审讯室爬出来，爬到你们每个人面前。他就要说：‘XXX，我来找你了。’你就要回答，‘张慕津，我等你好久了。’听见没有？来，试一遍。我当张慕津。XXX 我来找你了。”于是大家咕哝着说：“张慕津，我等你好久了”。“不行！声音太小，重来！”又试了两次。我很为难，因为我就在审讯室门口。他第一个肯定会爬到我面前。我必须第一个当丑剧演员，第一个当众侮辱我自己，侮辱自己的同事。

可是没办法，门开了，张慕津爬了出来，我们按他们的要求，“表演”了一次。这时我看到，张慕津已经被剃了一个阴阳头！张慕津沿着走廊爬过去，我没有心思听这些没有人性的“表演”。我在想，这是什么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啦？我们是敌人吗？即使我们这些共产党员真是敌人，那么现在当了俘虏，也不该虐待俘虏，侮辱俘虏人格。

这以后，走廊的南端又传出一阵喧闹。原来是几个手执皮带木棍的人要党办主任何介人和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林泰两个人对打！我听到喊声：“使劲！”——“使劲！”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我们的学生吗？怎么会这样！[注 15]

接着，审讯室内忽然传出一声呼叫：“贺鹏飞来视察了！”几个人走出审讯室到楼梯口迎接。我们正躺在水泥地上。“快起来，跪好，低头，手背在身后，头距离地面 15 公分，不能超过 20 公分，也不许顶在地上。快！”刚刚“整理”好，贺鹏飞就上来了。我还来得及偷看了一眼，果然很像贺龙元帅，脚踏大皮鞋，手提一条皮带。审讯室里的人像是汇报什么，贺鹏飞从我前面走过时，看见我因为支撑不住他们规定的姿势，已经把头顶在地上，就用皮鞋踩我的头，并且厉声说：“不许顶地上！”他这一踩，我头上已经结了疤的伤口又滴下许多血。虽然贺鹏飞是当日“红色恐怖”行动的指挥者之一，但是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件事。也许，大家对贺龙元帅的冤死十分同情，不愿再提他儿子的事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很快当了少将，病故时已是中将。[注 16]

半夜三、四点钟的时候，又把我们这批“劳改犯”转移到生物馆，[注 17]要求天亮以前转移过去，不许有声音。天亮以后，先安排校医院的医生护士给我们这些人上药。校医院的护士小杨见到我大声惊呼：“唉呀！怎么打成这样！”他们上药的时候手直发抖。我只穿了件背心，成了件血衣，身上多处打伤。可我看不见头上的伤。后来照镜子才知道，头上多处有血块，脸上也有伤，所幸不在要害处。

排好位置，我左边是 1 号钱伟长教授。我是 2 号。3 号是建筑系党委书记刘小石，[注 17]4 号行政处长李思问。排好以后，我们都坐在光板地上。这时来了许多人，每个“黑帮”有三个人押着，回家去拿铺盖、梳洗用具和换洗衣服。看样子，在这里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我走在三个押送我的人的前面。我家离生物馆很近。在路上，其中一个人对我讲，“我们是力学系的，我们认识你。他们不应该这样打你们。”我无言以对。

到我家门口，鸿文正在房内，开门看到我，一脸惊恐！押送的学生说：“梁老师，别紧张，你们有十分钟。”不知为什么，他们认识鸿文。说完就退出去并轻声关好门。经过

昨晚“恐怖之夜”后，他们的举动让我有一些温暖。鸿文两眼发直，但含着眼泪。几分钟之后，才说出一句话：“你伤得重不重？有没有内伤？”我告诉她，都是皮肉伤，没有内伤。我觉得她一个女人家，碰到这种情况，真是很难面对。这都因我而起，我实在感到歉疚。以后整个十年大动乱中，由于各种原因和机缘，我多次被整肃、绑架、关押。这种让家人因我而感到不安、无助、恐怖甚至丧命的歉疚的心情，一直纠缠着我，比我自己挨打，受刑讯逼供更加难过。我宁愿皮肉受苦，甚至伤筋动骨，也不愿受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

十分钟后，我估计实际上不只十分钟，我被带回生物馆。大家将褥垫铺在水泥地上，坐在地铺上等待。这时肚子饿了。从昨晚搬运二校门的垃圾到现在，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可以说是饥渴交迫。这时，由几个“革命群众”押解，几个“黑帮分子”到教工食堂取回吃的。虽然只是馒头加一块咸菜，但饥肠辘辘的我们，老远就闻到馒头的香味。可是接下来的事，使我们一点胃口都没有了，我宁愿不吃了。

黑帮分子们排成一排，一个学生在前面训话：“你们要吃饭吗，那就听好，你必须说：‘臭黑帮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 XXX 感谢毛主席给饭吃。’听清楚了吗？试一下。”第一个是钱伟长教授。他说完了那段侮辱性的话以后，那个学生又喊：“你还得加一个‘大右派’，重来！”于是钱先生又来一遍，加了一顶帽子，领了口粮，站在原地等候。这时我认出了这个学生好像是工程化学系的。以后化工系的辅导员告诉我，他姓杨，是个大个子。“第二个！”他喊。第二个是我，我没有多加什么就过了关。第三个刘小石，也过了关。第四个是行政处长李思问，他是山西人，乡音非常重。他说“王八蛋”，像“王八党”。这个学生有所发现说：“他有创造性，他说王八党，你们要学他，都说王八党。”这时，几十个共产党员都低下头，沉默抗议。我实在忍不住，低声说了一句：“这不合适。”这个学生扭头瞪了我一眼。我也不眨眼地看着他。几秒钟的对视，我发现他的眼神在变化，变得柔和一些了。我听出他的声音也柔和一些了。不知别人是否听得出来：“那就还王八蛋吧！”

下午，又有了新花样。一个叫马楠的学生带了两个“随从”，来到生物馆，审问我们这些人。听说这马楠是军人后代，绰号叫“马楠将军”，到处打人抄家。第一个叫走了钱

伟长。这时，我听到门口嘈杂吵闹，不知是出了什么事。过了一会钱伟长回来了，我看他后背被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惨不忍睹。因为第二个被叫到审讯室的不是我，还有时间和钱先生说两句话。钱先生说：“门口有一些在闹，要求把‘黑帮’交出去给群众处置。这里的看守说，你们不老实，就把你们交出去。”钱先生说：“那些无组织的‘群众’，可能情况更糟，更危险，我宁愿关在这里了。”

不知是第几个，叫到我。我走进审讯室。马楠嘴里叼着烟卷，两条腿放在桌子上，十足一副兵痞模样。[注 18]一边站一个瞪圆了眼睛的大汉。审讯室里放着一张凳子，其中一个大汉叫我坐下。马楠提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然后拿了本毛选第一卷，叫我读几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实，当时我们大多数“黑帮”都可以背下来的。念了几段，马楠说：“我问你，你说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我当然回答“好得很。”“你真是这样想的？”我说：“是”。突然，马楠问：“你认识蒯大富？”我答：“我知道他。”马楠说：“听说你早就认识他，还查过那个‘蒯’字。”我说：“我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就查过这个字，不是早就认识他。”我又把 1964 年到部队当兵的情况简要地说了一遍。我心想：我今天见识到的马楠，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凶恶。另外他的问话说明，他了解我带队当兵的情况。时间不长，马楠就放我出来了。

左右夹攻，两面不是人

马楠“将军”审问我时，提到蒯大富。其实，早就有好多起提审的主题，就是蒯大富。

开始时，比较多的提审是追问我和蒯大富的关系。有的态度很好，讲道理。有的态度恶劣，甚至粗口谩骂。他们追问我的一个根据，就是我当兵时说过“我早就认识他”。然后一直关心照顾他、培养他。我屡次解释，我从来没有说过“早就认识他”；我只说过，我早就查过那个蒯字是因为看《三国演义》里面荆州刘表下面，有个人姓蒯，如此而已。我比他大十岁，他 63 年入学，我怎么会“早就认识他”？一般经我解释后，这些人就语塞

了。但是后来有两次提到“艾知生为什么选蒯大富作为学习‘九评’的典型？”还有一起提到《人民画报》，我有点莫名其妙。但在工作组撤走以前，工作组的人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到《人民画报》，搞得我一头雾水。

大约在7月底的一天晚上，文工团的一个政治辅导员赵燕秦[注19]冒着很大的危险找到我，向我通报了一个情况：“工作组查到1963年的一期《人民画报》，封面上有清华大学1963年入学新生座谈会的照片，其中有蒯大富。[注20]你是负责对外宣传的，那么这照片必经你手。联系到当兵、广播台、学习‘九评’、批三家村，你自己讲过，艾知生叫你注意培养这个人，说是能说善写，是个宣传干部的料，所以工作组逐渐形成了一个看法：蒯大富是前党委留下的一根反工作组的钉子。这根钉子与前党委的联系，只能是通过你罗某人了！”这话虽不是事实，但拨开了我一头雾水。以后，我就知道如何小心应对了。赵燕秦同志许多年前就因病去世了。我必须写下这一段。虽然我们经过残酷的迫害，血腥的“群众专政”，但是，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仍然有许多人性的关爱和不顾个人安危以救助他人的同志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工作组撤走了，听说蒯大富平反翻案了，恢复了自由。我以为，那个捕风捉影的“钉子公案”可以休矣。然而，正好相反，这时又换了一批人来“提审”，态度更凶恶。不过，我已大体上明白了他们的疑点和意图。这批人多是同情和支持蒯大富，并且反对工作组。他们认为，是前党委会和工作组沆瀣一气，抛出蒯大富，打成反革命，以成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而前党委和工作组的联系，又是通过我罗某人了。后来许多情况证实了我的想法。虽然，这一段历史已经没什么人提起了，但是蒯大富们的潜意识里，可能还埋藏着对党委及党员干部尤其是对我本人的一些“恨意”，直至引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这一清华园内的一大冤案吧。

从工作组开进清华园，到蒯大富翻身掌权这一段的历史，常常被忽视，甚至有意的遗忘掉。好像清华园在大动乱的十年中所遭受的破坏，所有的一系列的血腥罪行，都源于蒯大富。这是不公平的。[注21]打砸抢烧杀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我们深受其害，记忆犹新。

“四人帮”倒台以后，清华清理文革中抄家物资的小组通知我们去认领自己的东西，我没有去。有人去了，回来告诉我，别去了，去了更失望和生气。经过抄家，又经过后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时搞的一次“分浮财”，即把抄来的东西打了个低价，让“革命群众”——很可能就是抄家的人——买走了，因此我不去认领。最后清理小组给我退回一个皮箱，因为打不开锁，所以用刀把箱子割开，东西全拿走了。

因为丢下有我的一两张照片，所以退还给我。我的全部衣物被洗劫一空，多年以后在江西鲤鱼洲农场劳改时，有位工人告诉我：他所在连队有个工人，床上铺的盖的都是抄我家得到的，其中现在铺在床上的一幅油光油亮的藤制凉席就是我家的。他是北方人，怎会有这种南方的东西呢，我也没有去“认”。这些，都是在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时出现的事，不应由他负责。即使有些是蒯大富掌权时代发生的，我认为前面的这些“红色恐怖行动”就已经开始了，后来的只是前面的延续，根子缘起都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否适合湖南当时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拿来套在今日的城市和高等学校，则肯定是错的，即机会主义的，所以必然要受到惩罚。请注意，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恐怖行动，其理论、路线、政策的根据都在这份报告里。以我自己来说，“反右”时我执行了“左”的扩大化的政策，我对建筑系学生中划的23名右派负有一定责任，我应该受到后来这些“红色恐怖”的冲击，也就是惩罚。但是，无政府主义也是一种机会主义，谁又来惩罚无政府主义呢？这样惩罚来，惩罚去，中国就一定不能平静，要七八年来一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体现的就是这一斗争哲学，是一切动乱的总根子，现在根子还没有挖出来，没有得到批判和惩罚。希望不会永远得不到惩罚。领袖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但如果领袖犯错误得不到应有的纠正或惩罚，那么就会使整个民族和国家遭受灾难。这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哀。我们常说日本人不认错，还修改历史，以误导国民，这的确可憎可恨。可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就可以忽略某一阶段的历史，隐瞒历史吗？

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段历史时，内心就会有不可抑制的伤痛。希望历史永不再重演。■

【罗文胡注】

罗征启《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第一章评注

胡鹏池



作者简介：

胡鹏池：1945年生，江苏人，清华大学精仪系1968年毕业。当过工人、技术员、工程师、车间主任、教师、官员、经理。2012年末，开始从事历史研究及文学创作。在《经济观察报》、《炎黄春秋》、《文化学刊》等纸媒，及《共识网》、《记忆》、《昨天》、《华夏文摘》等电子媒体上

发表文章百余篇。

2013年应邀出席首师大举办的《创伤记忆与文化表征》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创伤记忆的文学表达》。2015年应邀出席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举办的《周有光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常识的社会功能”浅论》。

著有：《通俗政治》香港 天地图书，2015；《芦花瑟瑟》深圳海天出版社，2016；《清华七二七事件——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与 **但桑** 先生合著）香港 田园书屋，2017。

近期致力于“文革史细节研究”（暂定名），已完成的有：

《夏雨遍地流——评秦晖先生《血腥之夏》的混乱与错误》（胡鹏池 **但桑** 蒋南峰合著）（《记忆》176期），

《关于“历史决议”——评杨继绳，〈天地翻覆〉之“前言”》（《记忆》189期），

《三个软硬伤——评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五章》（《记忆》197期），

《一条线还是两条线？——评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五章；兼评钱理群〈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第一章》（《记忆》197期）。

注者说明：

罗征启近著《清华文革亲历记》，全书由长短不一的10篇文章组成，共约15万字左右。罗书原文的每一篇文章一般都无注解，有的虽有很少注解，但嵌于文中。

本文所加的“注”都是录入者胡鹏池所为。与一般文章的“注”有所不同，形式并不规范，选材也相当散漫。有些与其说是“注释”，不如说是“随笔”。

本文之“注”的来源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对校友的微信的综合整理；另一类是胡本人阅读后的思考。其目的就是将一些校友、朋友包括胡鹏池本人的讨论与想法，择要保存，以期做进一步的讨论与思考。本“注”后面，附有五个附件，为的是对注释做些补充。

[注 01]罗书第一篇《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主要讲的是“清华八二四事件”。

这一事件是清华初期文革中的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集中彰显了文革的残酷性残暴性、灭良知灭天理、无人性反人性。

对这一事件，在校史《清华大学一百年》中早有明确记载：

“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纠结十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来校搞“红色恐怖”，高呼“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进行“镇压右派”的游行示威。这些红卫兵撕破大礼堂前所有的大字报，推倒“象征封资修”的二校门，并强迫中层以上的干部拆卸搬运被推倒的二校门的砖石，搬运稍有缓慢即遭毒打。在西大操场举行游行示威，还对部分所谓“黑帮份子”、“黑五类”进行抄家。把大批中层以上干部从家中拉出来，半夜集中在西阶梯教室毒打。以后又关押在科学馆和生物馆折腾经两月之久（后来称之为“八二四”事件）。 ”

[注 02] 这段话与史实不符。

蒯大富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失去自由的准确日期是1966年7月4日。这天早晨开始，蒯大富被限制在自己的宿舍里，后来曾被转移到一号楼宿舍。7月20日恢复自由。8月4日晚，周恩来总理到清华召开全校大会时为蒯大富公开平反。

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的时间刚好整整一个月，失去自由的时间是16天。

同年9月24日，蒯大富发起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开始以造反派领袖活跃于清华政治舞台；10月6日，蒯大富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十万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领头宣誓。在此后的两年不到的时间内，蒯大富成为全国红卫兵造反派的标志性人物。

[注 03] 蒯姓虽然不常见，但历史多出名人与能人，如蒯通、蒯越、蒯祥等。

《三国演义》上姓蒯的名人叫蒯越（字异度），东汉末年荆州太守刘表手下谋士，其事迹见于《三国演义》第40、41回。曹操下江南不久，刘表病亡。蒯越力谏刘表幼子刘琮降曹，他对刘琮说：“荆襄之民，闻曹兵至，未战而先胆寒，安能与之敌哉？”刘琮听从了蒯越等人意见，不战而降，拱手将荆州让与曹操。曹操得荆州后对蒯越说：“我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也。”

[注 04] 作者对自己的评价相当客观，起码，与我对他的感觉是一致的。

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罗征启老师大概是在1989年。那次我带着家乡的一位市委副书记去拜访他、请教教育领域如何改革开放等有关问题。罗老师在深圳大学的校长办公室接待了我们。给我的印象是：他可真是一位既不善于言辞，也不平易近人的人，一上来的几句话就将远道来的客人堵在了南墙上，场面好生尴尬。不过，他说的具体内容却基本上没有错。

至于，艾知生与罗征启都认为蒯大富是当宣传干部的“料”，这种看法只是局限于“能说会写”这种表面特点，所以评价还是太低了。事实证明，蒯大富是当“造反司令”的料。

[注 05] 黄报青，1929年生，土建系系总支委员、副教授，民用建筑教研组副主任，1968年1月18日自杀身亡。黄报青先生是清华文革中，先后遭到八九红卫兵及井冈山红卫兵的残酷迫害，而直接致死的第一个清华基层干部、教师。

详情见于罗书第八篇：《缅怀黄报青先生》。

特别需要强调补充的是，黄报青先生也是“八二四事件”中的受害者。据工化系研究生陈中平校友回忆：

“八二四下午我正在礼堂前大字报区，突然身后人声喧哗。只见几名臂戴清华附中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架着一个人边走边打。那人两只手和身体成十字状（可能用棍子固定），由两名红卫兵拽着，后面一个用皮带铜头使劲鞭打，像惩罚一头不受驾驭的牲口一样。被打者是建筑系副教授黄报青，他脖子挂的牌子上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因为他说“蒋南翔不是黑帮”而遭受刑罚。”

[注 06] 印甫盛，江苏如皋人，自控系学生，清华文艺社团党支部书记。当时清华文艺社团的主要领导是印甫盛，胡锦涛（团长），任丽翰（女）、李桂秋（女）等。

[注 07] 万润南，江苏宜兴人，土建系学生。时为清华文艺社团集体住宿的文艺社成员。印甫盛和万润南，是两个与罗征启关系特别密切的学生。

[注 08] 经过 1964 年前后兴起的“学毛著运动”，我们这代大学生们全都知道这些东西出自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身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罗征启怎么会“不知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可见一代一代人所受到的教育是有差别的。

“毛选”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选”被称之为“雄文四卷”，“雄文”里的雄文就是这两篇。

[注 09] 校友周坚对“6 月 4 日”有怀疑，他认为当时清华党委还没有被打倒，这些中层干部怎么会在 6 月 4 号以后就失去自由了呢？

我也有与周坚同样的怀疑。这个日期似应是“6 月 10 日”更合理。也许“6 月 4 日”是“6 月 10 日”由读音相近而产生的笔误。

[注 10] 二校门被推倒的准确时间是 1966 年 8 月 24 日下午六点。这一天，工物系七字班学生孙维藩去历史博物馆参观大庆油田展览。下午回来，看见二校门周围许多人正在围观二校门被拉倒的情景。孙同学举起相机，按下快门，将二校门倒下的一瞬间照下来了。此时是下午六时整，二校门恰与地面成 45 度角向前方倒下了。（有孙维藩日记为证）随着一声巨响，一阵蔽天飞扬的尘土，真的清华“二校门”就永远告别了这魔鬼狂舞的世界。校友王允方说：这张照片“是二校门告别历史、告别世界，倒下前的痛苦身影。”

这天上午，我（机械系八字班学生胡鹏池）借了同宿舍同学吴涤新的一辆旧自行车，应约去牛街的曹队长家与几位四清时领导与队友们聚会。中午曹大嫂做的是蒸包子和鸡蛋汤，下午继续聊天。傍晚回到学校时，二校门刚刚被推倒，周围是东一簇、西一簇静穆的人群，地上分布着东一堆、西一堆静穆的砖石混凝土垃圾。二校门还剩下四个两三米直径的柱墩子，两头两个小一点，中间两个大一点，一大堆的黑帮们正围着这些柱墩子在转圈，一个个胸前挂着黑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子，弯着腰，举着双手，口中喊着：“我是黑帮！我有罪！”“我是黑帮！我有罪！”“我是黑帮！我有罪！”声音都是嗡嗡的，转圈都是顺时针，缓慢地、连续的。

夕阳从工字厅前的那条路上一路泻过来，挡也挡不住，金黄色的，闪闪有光芒，很耀眼，因此很美丽，二校门一带的树木葱茏，树影很长，人影也很长、很长。

我默默地看着，就这么干瞪眼似的看着，也不走脑子，竟然没有记住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也记不清看了多长时间，然后又默默地走开了。我走开的时候，夕阳还在继续地残照着，黑帮们还在继续转着圈。

【注 11】被勒令前来搬运垃圾的黑帮劳改队的队伍颇庞大，约有五、六十人。在“八二四”那个接近黑夜的黄昏，在这支黑帮劳改队中发生了很多悲惨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漫长的黑夜里，还要发生了更多、更多、更悲惨的故事。

●原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多年后回忆“八二四”，仍然心有余悸。那天，何东昌感冒发烧，虚弱乏力。他背对着二校门位置，低着头铲石块。当时李传信正面对着二校门的残垣，他猛地看到有块石头要砸下来，就赶紧大喊：“老何，当心背后有石块！”何急忙躲闪，逃过了一劫。

何东昌说：“要不是李传信（党委委员）大喊一声，我恐怕早就没命了。”“这种侥幸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感慨，我至今记忆难忘。”

●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胡健回忆道：“那些造反的人，用皮带抽打着被抓去的干部

拆墙背砖。背砖不是量力而行，而是给多少，就得背多少。因为背不动，倒在地上，拉起来用棍子、皮带疯狂地抽打，背不动也得背；一直折腾到凌晨以后，累得人们骨头快要散架了，许多同志累得走不动了。每个人都被他们打了。”

●一位女干部回忆说：824 晚上，我们这些干部被强行拉到二校门前，清理废墟，搬运砖石。现场四周站着许多红卫兵，有的扬着皮鞭，呵斥抽打，气氛十分恐怖。每个“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都被勒令排队，自辱性地自报姓名。胡健个子较高，与他一起抬石块的是个女干部，个子矮小，动作慢了点，挨了几鞭子。何东昌感冒发烧，有个女干部正来例假，也只好硬挺着干活。

●这位女干部还回忆说：张慕津清理砖块时铁锹挥动过高，划破了谭浩强的额头，血流不止；他赶紧向在一旁负责看管的人称“小队长”的学生举手报告，同时反映几个人身体有状况。“小队长”请示了一下回来发令：“何东昌、谭浩强、某某某”出列。遂带领这六七个人穿过一教二教，来到静斋附近，训斥一顿后就地解散。

以上摘自王允方《又到八二四》

[注 12] 罗征启讲的园林队师傅的故事，送开水老太太的故事，女干部讲的小队长的故事，这些小人物的小故事，全都在诉说着一个真理：即使在大恶如斯的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到处都有善良的人性在闪光。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没有它们，我们摧毁不了文革。

因为它们有一个强大的、真正“伟光正”的名字，叫“人心”！

[注 13] 校友高晋占指正：歌词是“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注 14] 校友郁吉仁对此有一项更正：

“邵斌的眼睛没有被打瞎。我和邵斌在五七农场共过事。从鲤鱼洲到大兴团河农场。特别是在团河农场，就是我们二人负责煮猪食，每天在一起煮几锅。邵斌老婆李德鲁是我

们数力系副书记。所以邵斌就分在我们副业连劳动。邵斌是红小鬼，很正道、单纯、踏实。邵斌每天写日记，几乎是流水账，把看到的听到的记下来。有时邵也写些不理解的事，如批彭德怀之类的事。幸好他出身好，根正苗红才未招如罗老师一样大难。”

（详见附件一：邵斌前辈的来函）

补充：邵斌后来虽未遭到罗征启那样的大难，但仍然遭到批斗和迫害。《井冈山斗邵兵团》写的批判文章《蒋贼心腹反动透顶的邵斌》，全文刊于1967年12月21日《井冈山报》。邵斌的妻子，数力系总支副书记李德鲁同志也遭到批判与迫害。

[注15] “八二四事件”是清华文革的重大事件。对这一事件，罗征启与刘冰都有相当详细的回忆，两者相互印证、相互补充。（详见附件二：刘冰关于“八二四”的回忆）

红卫兵们强迫“黑帮”们相互殴打的暴行，不是偶然现象，在刘冰回忆中也有。

[注16] 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1946年生，清华机械系0字班学生，当时是清华大学“临筹”和红卫兵“临时总部”的头头。后受父亲冤案株连，遭受迫害，改名换姓，在津沪间的货运船上劳动，过着颠沛流离、动荡不定的生活。文革后，贺鹏飞出任海军副司令，中将。2001年突发心脏病逝世，年仅55岁。

文革中清华有人贴大字报揭发，说贺鹏飞进清华是蒋南翔“开后门”。文革后，蒋南翔曾讲了事情的经过：有一天，贺龙亲自给他打电话，说：“南翔同志啊，我家小龙想上清华，你看怎么办呀？”蒋南翔回答：“那考一下吧？”结果考得不好，蒋就让他附中补习了一年才进了清华。

[注17] 刘小石是土建系总支书记。当时清华的系级党组织是总支，没有党委。

[注18] 马楠，水利系九字班学生，当时是“清华大学红卫兵”（即八九红卫兵）的总部及“临筹”负责人之一，分管保卫与行动。他对罗书中的这一段有长篇解释。（详见附件三：《神逸的聊天》。“神逸”即马楠的微信名。）

马楠微信对“八二四事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他说：“砸二校门当天早晨，我们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联合会议制定章程，突然有人打到甲所电话，说有些人可能要砸校门，问我们头头知道不知道？我们立即就此事研究阻止方案，並要我立即赶到現場阻止、並下达总部命令。-----”而同为红卫兵总部委员的阎淮的回忆则完全不一样。（参阅附件四：阎淮：关于“八二四事件”的回忆）

[注 19] 赵燕秦，女，她与印甫盛、胡锦涛等都是清华文艺社团的主要领导人。赵燕秦这人我也认识，颇好感；赵对罗征启讲的这个“钉子公案”，我在工作组时期就听说过。

[注 20] 2014 年 5 月的一天，我在常州与几个常州校友聚会。席间，有位清华工化系校友（与蒯大富同系），讲了好几个蒯大富文革前的精彩故事。

1. 这期《人民画报》出来后，蒯大富买了不少该期的《人民画报》寄回老家的亲戚、同学、老师处去炫耀，搞得买饭菜票的钱也没有了。

2. 有一次校内的游行庆祝活动（可能是庆祝卫星发射成功），游行队伍中自有人领呼口号，并高呼“毛主席万岁！”忽然间，蒯大富一个人跳到队伍外面，站在新水利馆西门的台阶上，高呼“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

3. 图书馆门厅里曾张贴了一张宣传画“向科学进军”，蒯大富写大字报批判说：“向科学进军”不提阶级斗争，是修正主义的口号，应该是“做三大革命运动的接班人”。于是，图书馆只好将这张宣传画收回去了。

这些故事反映了文革前的蒯大富不仅思想极左，而且因为好出风头，而导致行为怪异。正如罗征启所说，这不仅仅是“左派幼稚病”，简直就是神经病。

[注 21] 作者多次讲：“好像清华园在大动乱的十年中所遭受的破坏，所有的一系列的血腥罪行，都源于蒯大富。这是不公平的。”

首先，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其次，我认为强调这个观点是不必要的，因为这并不是症结所在。

事实上，在文革后，对于什么样的罪错应该归于文革本身及文革始作俑者？什么样的罪错应由蒯大富负责？绝大多数校友都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既不应该为使始作俑者脱罪而将坏事推给下面；也不应该为证凶手无罪而归于上面的教唆。

如果我们将一切罪错往下推，那就没有了对体制、观念的反思；如果我们将一切罪错往上推，那就没有了人性的反思。对体制、观念的反思和对人性的反思，都是文革反思的重要内容，两者缺一不可，两个拳头都要有，但不一定都能硬。尤在当下，对人性的反思尤为基本、尤为根本、尤为重要。

固然，好制度、好观念，能使坏人变好人，或者变得不是那么坏；坏制度、坏观念能使好人变坏人，或者变得不是那么好；但是好制度、好观念都是好人、明白人，逐渐积累与建立的。

这其中的逻辑关系都是不言自明的。■

附件一

邵斌来函¹

一、自我介绍

1948年，我正在黑龙江省五常县省立第六中学念书，经过几年组织的培养，3月份被介绍入党，4月份，和一位叫白宜棉的同学一道，被挑选送去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学习，准备毕业后回五常县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这个青干校的兼校长就是蒋南翔，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党中央东北局党报委员会，我们的班主任是刘宾雁。当我们这一届

¹ 这是邵斌前辈在看到罗征启的文章及有关的评注，发来的邮件。

毕业时，蒋南翔要在我们全校为他选两个秘书。不知为什么选了我，还选了一位学校的在职干部，宋廷章。我们先到东北日报社工作一个阶段，宋做见习记者，我做见习编辑。当我们正式为蒋工作的时候，就是写文章，他口述，我们笔录，再反复修改。

北京解放后，蒋又被调到团中央来，宋做他的秘书，我患上严重的肺结核，住院医疗三年；这三年，我选学了大学文科的一些基础课程。病愈，被分配到团中央学生部工作。1953年12月，他被调来清华，他决定调我来做他的机要秘书。

我在清华主要负责党内的工作：

1. 蒋在校外有些党内工作，以及校内工作要与上级党的领导部门请示、沟通的事情，这些，我负责联系，并保管文件，主要是中央与北京市委的。

2. 蒋在清华时是校长负责制，他曾请示成立一个党组作为集体决策机构，未被采纳，他就成立一个党内汇报会，由各系党总支书记和校一级党员领导干部组成，每周日晚开会，议决下一周或当前一个时期的工作。这个会由我逐个通知，并做记录。

3. 蒋做报告、演讲，我记录并整理出来；或协助起草文件或文章。

4. 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蒋也关心我的成长，鼓励我攻读数学，允许我不妨碍工作情况下，去听些课。那些年，我没成家，住在办公室，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没有节假日！

二，关于“我的笔记本、日记本”

蒋南翔从来不知道我的什么笔记本、日记本。（文革中）我的笔记本和日记本是从我家抄走的。

蒋南翔经常说，自己是学文的，对于理工一窍不通，一方面自己要“改装”，努力学些理工知识，增加共同语言，便于工作；另一方面，他多次说“我们是两种人会师”——“我们从解放区来的和你们地下党的会师”，要互补，要团结。在工作上，蒋南翔拿大注意，这群“清华牌”的干部，给他清华化，具体化。蒋离开这些干部寸步难行！他不断地

夸这些干部“精彩”，别人说这些人半个“不”字他都不高兴，上级也调不动他们。而這些清华牌的干部，也服他，什么“南翔精神”，就是出于他们的口！蒋南翔和这群“清华牌的干部”之间，根本不存在“信任与否”的问题。

至于我，我自觉是个小字号，我的追求是学习，是未来。我也有自尊，有独立人格，有我的自由思想，我的判断，我绝不人身依附。我不会做什么人的“眼睛”。有人说我是“蒋南翔的人”，我感觉对我是污辱！

我的笔记本很多，听报告、开讲座，我都记；我觉得要学习的东西我都记，上百本。我有感时，我又把我的感悟写在日记上。大跃进，我想不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想不通，批彭德怀我想不通。看到大量饿死人的文件时，我痛哭流涕，七千人大会时，号召全党总结经验教训，声称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都是宝贵的——采取这种态度，我信服。我重温马克思的论述，我明确意识到，那是搞乌托邦，功劳大了，脑袋膨胀了，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为此，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的老伴带我的2岁的孩子坐“牛棚”，差一点家破人亡！■（编者说明：本文有省略）

附件二

刘冰：关于“八二四”的回忆

——摘自刘冰《风雨岁月》

初次上书毛主席（1）

“八一八”大会后，北京的红卫兵响应林彪的破“四旧”号召，从8月20日开始走上街头，张贴破“四旧”宣传品，发表破“四旧”的演说，学校里也出现了破“四旧”的大字报。

就在这个时候，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梁思

成教授被大学红卫兵揪斗。一些红卫兵强行用旧戏装的蟒袍玉带乌纱帽把梁思成同志装扮起来，用绳子牵着，打着锣鼓，喊着“打倒反动权威”的口号，在清华园内游行示众。过往的人们看着这位年逾花甲、体弱多病的老人，被推搡着、拖拉着，东倒西歪、踉踉跄跄、挣扎着行进，都目不忍睹，许多人低下了头，有的人愤怒，有的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这不只是对梁思成同志个人的侮辱，简直是对清华大学这座最高学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亵渎。谁能相信这是“革命”！

第二天的晚上，我被职工中的一个群众组织揪斗。会场设在西大操场原校医院门口，会场中央摆了两张桌子。我和校医院党支部书记张寿昌同志被一群人簇拥着推到桌子上，有两三个人摁着我的脑袋，扭着我的胳膊，还有人在后面狠劲地打我的两条腿弯子，要我跪在桌子上。周围的人叫骂着、呼喊着的，要我交待所谓迫害校医院几个护士、医生的“反革命事件”。我拒绝交待，并据实申辩。没等我说完，就劈头盖脑地打了下来，又是打耳光，又是用棍子打脊背，把我从桌子上推到了地下。我挣扎着呼喊：“抗议侵犯人身自由！”有两个人抱住我的脑袋，不准我动，强行用推子给我推了“阴阳头”。然后，他们把挖空了的半个西瓜扣在我的头上，让我站起来，几个人扭住我的胳膊，其他一些人叫喊着，一边用棍子打我的脑袋，一边推着我在马路上转游，从西大操场旁边绕过大礼堂西边的小桥，一直游到第二教室楼才放了我。最使我气愤难忍的是，有些人这天晚上不仅揪斗了一些女干部，还给她们都剃了“阴阳头”，第二天我看到那些用毛巾捂着头的女同志，心里实在难过：为什么这样不讲文明，侮辱人格呢？

8月24日晚上，在清华发生了一场罕见的肆虐事件。白天我扫马路、拔草，劳动了一天，直到下午6点半才下班，累得腿都软了。我拖着疲倦的身体，走到工字厅已是7点半，晚上再来上班实在受不了，便向值班的小任同志说明了情况，请求晚上不再上班。小任同志非常同情我，立即表示同意，并且提出要我一定待在家里，哪里也别去，一切由他负责。从小任同志的亲切嘱咐中我会意有什么事要发生，但不便细问。告辞了小任我回到家里，身体虽然得到了休息，但脑子仍在不停顿地思考，总担心要发生什么事。大约9点钟，我

住的九公寓后面的马路上有人大声嚷嚷：“大家快去看，一些学生在拆二校门。”“有什么好看，那是破坏！”一个声音有点嘶哑的人吆喝着。我从房间北面的窗子向下看去，马路上行人匆匆，朝教学区二校门方向拥去。大约11点钟，有几个工人模样骑自行车的人从七公寓门前往西南门走来。八公寓门前有几个乘凉的人问道：“二校门是咋回事？”那几个人停住车说：“嗨！是一些大学生押着大批校系领导和机关干部，强迫他们拆二校门，不拆就用棍子打，已经拆了一半了。”那几个乘凉的人说：“这叫什么？”骑车人回答：“破‘四旧’呗。”乘凉人问：“这也叫‘四旧’？”骑车人说：“瞎胡闹呗。”从这番对话中我了解到当晚“二校门事件”的基本情况，也了解到人心的向背，群众不赞成这样的“破四旧”。拆二校门的具体情况当时我无法了解，我只是担心，这种行动不要发展到去拆除其他“旧建筑”。那天夜里，胡健同志被抓去了，后来他告诉我：“那些造反的人，用皮带抽打着被抓去的干部拆墙背砖。背砖不是量力而行，而是给多少，就得背多少。因为背不动，倒在地上，拉起来用棍子、皮带疯狂地抽打，背不动也得背。一直折腾到凌晨以后，累得人们骨头快要散架了，许多同志累得走不动了。每个人都被他们打了。”工会的刘泰同志说，那天夜里他连打带累回到办公室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初次上书毛主席（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天夜里，我站在北面房间的窗子前观察马路上、院子里人们的动静。直到12点钟，听到马路上有人说：“二校门快拆完了！”这时我才怀着悲愤的心情，拖着疲倦的身躯躺下休息。心中有事难以入睡，辗转反侧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冲了一个冷水澡，迷迷糊糊渐渐睡着了。大约凌晨2点钟，有几百名清华附中的学生来到大学教职工住宅区，分别把几个公寓楼团团围起来，呼喊在林彪讲话中那几个打倒一切的口号，谩骂着、叫嚷着，冲进了九公寓。我被惊醒了，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还未来得及穿上长衣裤，学生冲进了我的卧室，几个人架住我就往外走。在楼梯上，几个电机系的大学生拦

住了他们，大声恳求着：“附中的同学们，你们要注意政策，别这样！你们把刘冰交给我们好吧？”“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干扰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们是大学电机系的同学，负责看管刘冰的。”“不行！你们让开路！”双方大声地对着话，相互争着来回拉我，中学生人多，把几个大学生挤在一边，架起我走出楼去。在楼门口他们把我的眼睛蒙了起来，几个人扭住我的胳膊，抓住脑袋往下摁，推着我往前走，并且用皮带抽打我的脊背，前后左右都是人，喊着口号，边走边打。往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走的什么路，我也不知道，只感到时间很长，走了很远。打我的时候，开始感到疼痛，后来感到麻木，最后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他们都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不懂事呀！我大声呼叫：“你们违反政策！”他们全不听。无可奈何！只有任其宰割了。就这样走啊、打啊，大约有一个小时，我估计可能是在校内的马路上转游，搞“游行示众”。后来走进一个房子里，不打了，让我跪下，去掉了蒙在眼睛上的毛巾，我才发现这个房子是大礼堂西侧的阶梯教室。各系的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各部正副部长、校行政各处的处长，都集中在这里，成行地跪在地上。水泥地坚硬而不平，两个膝盖觉得有点凉，后来感到痛；最难受的是腰部，又痛又酸，因为在路上有几个人用脚踢了我这个部位。我请求坐在地上休息一下，但不允许，只好就这样跪着。我看着面前一片跪在地上的同志，想起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仿佛他那尖厉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开展猛烈的进攻！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感到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我心想难道跪在这里的清华党组织的骨干们就是这场“革命”要进攻、要打倒的对象吗？这样的行动就是响应“副统帅”的号召？这真是出奇！真是可笑可悲！

天将拂晓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号令，把我们先转移到了科学馆，后又到了生物馆，然后宣布纪律：不准回家，不准乱说乱动，一切行动都要听从红卫兵指挥，如有违犯，要严厉制裁。在生物馆，每天让我们背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表忠心，早请示，晚汇报，接受红卫兵的训话。最使我反感的是一个戴着红袖章、穿一身旧军服、一只眼睛还有点毛病的年轻人。这人说话粗野，开口就骂，带着一帮人，把我们按在地上，用棍子抽打，然后又强迫我们互相打。谁打的我，打了多久，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脊背8月25日凌晨被

打麻木了，已经不知道疼痛。后来别的同志告诉我：“你的脊背上都是血，汗衫沾在肉皮上，全变成红的了。”强迫我用棍子打的是校医院院长谢祖培同志。他是一位留学德国的专家，为人直爽、忠厚，1957年虽然也被批判过，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好人，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我实在不愿意打，也不忍心打。不愿打，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动手打一个非党的老专家呢？不忍心打，因为他是个老人，是个好人，我怎么能打这样的人呢？况且我从来没打过人。但那位年轻人硬是逼着我非打不可，我拒绝打，他就打我的耳光，还用棍子打我的脊背，骂我招降纳叛，包庇坏人。一直纠缠不休，无可奈何，我只好用棍子在谢祖培同志的屁股上打了几下。虽然只是几下，但一直到现在，我都感到内疚，因为我失掉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初次上书毛主席（3）

这场打人的闹剧和悲剧过后不久，生物馆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位炊事员，因为不满意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被抓了起来，他思想不通，在被关的房子里自缢身亡。那个年轻人命令艾知生把这位炊事员背出去送到医院太平间。过了两天，学生会的一个干部又被逼跳楼摔死。又是这个年轻人，要我和胡健去把那位学生会副主席的遗体背送医院太平间。因为我的脊背被打破，整个背部都成血染的了，有人看不下去，向他提出：“你看他的脊背，恐怕不能背了。”我的脊背已开始恢复疼痛感，也向他要求免去这个任务，他同意了。后来换成艾知生同志和胡健同志两人把那位同学背送到太平间。一位日日夜夜为大学生的伙食辛勤操劳的炊事员和一位学生会干部，该不是“走资派”、“反动权威”吧？他们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把他们逼上绝路？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革”的对象？实在令人费解！

我们从生物馆被放出来，已是9月下旬了。■

附件三

神逸（即马楠）的聊天

看完了（指罗书的第一篇）。如果你能见到罗征启先生请把我下面的话转给他，或用微信转给他更好。

做为回忆录纂写者，最重要的一条是事实求是，（不宜）对道听途说的，没有亲眼所见的结论写在纸上。总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吗，更不应被情绪所控写出不恰当的词句来。

下面逐条述之：

一，文中“马桶-----到处抄家打人。”是罗先生何时何地亲眼可见？或听某人亲眼所见转告于他？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不可能有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看到“到处打人抄家”的。

如果说“八二四”这天，砸二校门、揪斗“黑帮”行动、甚至出现抄家、打人的极端行动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和自控系、工物系、工化系的激进分子自发的行为，当时红卫兵总部负责人竟无人预先得知，只是事发后才研究对策决定下一步行动的。且总部大部负责人，或起码是我，根本没有抄任何人的家，更没有打过任何人！

所以罗征启先生文中“到处打人抄家”严重不实。

二，“马桶嘴里叼着烟卷，两条腿放在桌子上，十足一副兵痞样”，是否罗先生回忆有误？或张冠李戴？请他再认真地回忆一下，他能看到我当时穿什么衣服？

抽烟是刚学会没个把月。也许当时我在抽烟，但因家教很严，坐有坐姿、站有站样，一切按军姿培养，恐还此生还没有一次两脚放到桌子上的事例。至于“十足一副兵痞样”印象何来？况我“八二四”后几天一直穿短袖白衬衣，并未穿军装。

三，文中“我心想，我今天见识到的马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凶恶”，我还是感谢罗先生基本说了实话。

在所谓“审问”中，我语言严肃或有之，但只是面对面地询问，绝不会出现训斥、甚至漫骂以至打人之事的。

至于“传说中的凶恶”好象，当时还没有对我有什么传说吧！罗先生当时又是从谁嘴里得知，况且还是“传说”？即使是“传说”应具备以下几个元素：

1. 口传人之多；2. 口传时之长。而当时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罗先生何以识之？至于是否“凶恶”否，罗先生还是说了实话，感谢之至。但对“传说”一词又有不实之感。

四，罗先生文章“把被褥铺在地上”，他可知被褥何来？后来又安上木板床何来？难道是你家里的？这都是我们红卫兵总部研究后办理的。总该有些感谢之情或公正评价吧。

五，罗先生可曾知道，在科学馆、生物馆时，我曾在无他人时叫刘冰刘叔叔，叫钱伟长钱先生？甚至受钱伟长之托，到他家传口信并叫其夫人孔阿姨？并责令一参加抄家拿走孔阿姨现钱的一个工人把钱退回？

派性归派性，观点归观点，立场归立场，但在事实上必须遵循求是的原则，不能因情绪或其它原因，把不实的文字写在文章中。这是为人的最基本的准则。

既然是《亲历记》，那没有亲历的或记忆不清的甚至传说的还是不要写在纸上的好。

前几年，我们的政治辅导员、后在北京水务局工作的谭树魁在一次聚会上还公开对大家说：“当时我年级同学也要学别的系给他带高帽子游街，是马楠一声喊：‘我看你们谁敢？！我一直记在心中。’虽然当时揪斗、游街成风，而我水九就没参与过！所以，我到底是“凶恶”，还是有底线？一目了然。

文革后，学校盲传的我“穿军装拿皮带打人”的说法令组织也多次调查外调。但最后竟无一证据！这很说明问题了吧！

XX 兄，你是我中学校友，又是清华校友，对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如有可能，可把我的文章转给罗先生。

另外还有数段过去的文字，其中两段如下：

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砸二校门当天早晨，我们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联合会议制定章程，突然有人打到甲所电话，说有些人可能要砸校门，问我们头头知道不知道？我们立即就此事研究阻止方案，并要我立即赶到现场阻止、并下达总部命令。等我骑车赶到二校门穿过人群时，看到自控系 XXX 站在升降机上已开始砸字了。更有甚者，一个工人（是教我们学电焊的 XXX）已吊上钢丝绳用汽车开始拉门了。当时谁能制止得了？我敢说，当时

有人出面制止，非被狂热的人群砸扁不可！因为我在红卫兵中分管保卫和行动，只能在场。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老处长(因工作关系认识)就在我身后，也无能为力，只是对我说，靠远点别让钢丝绳打着。

已经忘了哪天了，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不知何时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多人弄到二教旁大阶梯教室暴打。当时是晚饭后，当我和贺鹏飞赶到时已打了有劲了。后我让贺去制止中学生们，他说：“我没穿军装，你（指我）平时都穿军服，怎么今天穿白衬衣？怎么你进去呀！”实际上，我们都怕那些王八蛋小孩子们不分青红皂白打我们。后来XXX过来，他认识附中这帮小子，才进去说了。让按我们研究的，先把这些人带到科学馆地下室保护起来。谁想到中学生刚走，又有大学生拿着棍子来打人，我们制止都不住，其中就有咱年级XXX。最后，电话校医院来四人带疗伤药品治疗，可只来了一个中年医生，其它人不是借口不敢来，就是以不给走资派看病是革命行动回绝。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安排解决这些人的床铺及看守问题。■

附件四

回忆“八二四”事件

——摘自阎淮《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

作者简介：阎淮，清华工物系0字班学生。时任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委员，是清华“八二四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他对事件有相当详细的回忆，其评价与反思不仅坦诚且有深度。他坦率地承认“这是老兵的错”。阎淮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水晶之夜。我赞成。清华“八二四事件”就是一起反人性的集体残害事件，是清华园的“水晶之夜”。

作者自画像

阎淮，1945年产于淮安。中学在圆明园，1964年就近潜入清华窃得物001班长，次年混进党。1970年发配凉州，后在煤炭部当差再到中组部听喝。“风波”后游走欧美亚，卖方块字为生。中国公民暂居美国，从心所欲不逾矩时，叶不落归树，

“八一八”后，毛泽东“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私下流传，学生们思想大解放。清华出现大量批评领袖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少量其他人的，可以说除毛泽东外中央领导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校外群众大批涌进清华，把这些“反动”的大字报传抄到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我忧心忡忡。

22日，清华反工作组的“八八派”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贴领袖的大字报较多，我们保守派中，也有人贴了。

22日晚，周总理冒雨参加清华万人大会，针对批评领袖的大字报说：“中央的问题，在中央全会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贴大字报，必须是增强团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总理讲话的精神我特认同！他淋着雨不让给他打伞的平易风范更令我敬仰。

23日，校内批评领袖的大字报和校外观看传抄者都急剧增加，最让我愤慨的是《周总理8.22讲话是个大阴谋》等攻击总理前一天讲话的大字报。我们红卫兵总部通过王任重，向中央紧急反映事态的严重。

黑暗的八月二十四日降临了！

晨5时，陈伯达在北大说，给刘少奇提意见可以写小字报，大字报要贴到室内的“内部馆”。我们如获至宝！上午“临筹”和红卫兵在清华甲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形势商议对策。贺鹏飞拿出“高91班”孙某某的被制止未贴出的给毛主席写的大字报底稿，我们义愤填膺。会议决定采取强制行动，处理“反中央领导的大字报”。此决定通过常驻清华的王的秘书，征得王任重的同意（有回忆文章说，是王指使我们干的，我没有确切证据。）

中午，“临筹”广播，希望把大字报贴到内部馆。有人问我，内部馆在哪里？我答，不知道，管它呢！

下午，清华附中红卫兵要求外校人员离校，封锁校门。

14 时，按计划，我们总部委员分别秘密通知本系红卫兵分散到附中集合。我私下让我系的红卫兵先用大标语覆盖住自己写的批评领袖的大字报。

15 时，十个中学的红卫兵被清华的汽车拉到清华附中。同时广播，让对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退出附中，否则责任自负！

16 时，清华和附中及外校共 12 校红卫兵，在附中召开誓师大会。贺鹏飞动员：“清华有一股妖风，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首次感受贺的鼓动才能。

17 时，12 校红卫兵 2000 余人从附中跑步进入清华（我带领工物系约百人），封锁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同时广播《最后通牒》，勒令作者一小时内撕去自己有关领袖的大字报，移入内部馆。否则后果自负。我们还广播了《安民告示》，它除了语气强硬外，还提到“我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破四旧”的风暴中，此时此地“纪律和注意”能起作用吗？）

18 时，对批评首长的大字报拍照。同时在贺鹏飞指挥下推倒“二校门”。

19 时，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标语。清华园笼罩在（红色？白色？）恐怖中，史称“清华八二四事件”。

我的严重错误

8 月 24 日下午 5 点半，12 校红卫兵控制形势后，清华派出所负责人来到大礼堂前的“指挥部”。他说，家属院中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很多，应该顺势彻底清理。贺鹏飞和刘菊芬让我去了解详情。到了照澜院派出所，我才知道：清华园里大中学的师生 2 万人，家属 3 万人；其中戴“地富反坏”帽子的几百人，派出所可随时管教；（右派归单位管理）还有几百个“残渣余孽”，派出所平时不宜轻举妄动，请我们重点清理。我回去汇报讨论后，决定晚饭后行动。

晚8时，在派出所设立“破四旧指挥部”，我和所长共同负责。各系红卫兵陆续到来，由民警和居委会的大妈指引，到“重点户”去抄家。我们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于都是大学生，当时可能有、但指挥部未发现打人和“贪污”行为。有同学提出要抄“走资派”和“学术权威”，所长对我说：“他们今天倒了，明天可能又起来，咱惹不起，还是整死老虎保险。”我对共产党的大小官员和理工科的各种权威，还是有点感情的；对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就不留情了。

据《清华文革亲历》48页记载，查抄出“子弹、刚开刃的刀、北洋军阀中将军服等”。我记得还有大量解放前出版的“反动书籍”和印有“国民党国旗”的各种证书，好像金银财宝不多。查抄的物品堆满了派出所的两三间屋子。我们主要是带回“赃物”，“坏人”让居委会纪录在案，以后严加管束。一个例外是，我高中同学郭某的母亲曾在国民党军队医院任职，在她家发现一些子弹壳，人赃并获被带到指挥部。她说是儿子在工厂实习时的劳动纪念品，我见是熟人让放了。（多年后我已忘却此事，郭见面还感谢我，令我羞愧不已无地自容。）午夜前抄家结束。

当时我认为抄家和批斗是文革题中应有之义的革命行动。文革后认识到，这是侵犯人权，是犯错、也是犯法。最近为写此文，看了一些清华师长的回忆，得知他们当时被毒打的情节。我更感到清华红卫兵罪孽深重，我作为总部委员应该向所有被我们虐待的师生和家属真诚地再说一声——对不起！

刻有“清华园”三个字、古典优雅的二校门是1911年清华建校时的校门。1933年，清华扩建，修了西校门，原校门便成为了“二校门”，是清华标志性的文物建筑。在世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二校门，就在那晚被我们清华红卫兵彻底毁掉了！我绞尽脑汁也回忆不出拉倒二校门的具体情景，以为是老年痴呆。日前听王克斌说那天他在现场，想找我劝阻，没找到，还挺奇怪。现在确认，其实我在干另一件坏事——抄家，一个人不能同时在不同之处干两件坏事，尽管当时我很想！克斌还说，你没参加毁二校门，这段的“我们”应改为“他们”。我不改！尽管“毁门”没有事前讨论、是临时起意（否则爱凑热闹

的我不会缺席），但事后我也赞成，同样有责任！文革中杀人与毁门都是对公民和文物最彻底的消灭，人死不能复生，文物不可复制，同样罪不可赦，都应受到法律严惩。在清华，杀人者坐牢，毁门者无恙！若现在谁再毁掉颐和园的重要文物，不杀也得判个无期。我们可以上推领袖下卸群众，现在谁也不可能再追诉惩罚我们。但是我的灵魂还在被煎熬被惩处！现在的二校门是文革后复制的。根据《文物法》，我们不但犯了错，而且犯了法，是清华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现已查实，北京在“红八月”打死万人，抄家近10万户，逐出京城12万户。主要具体施暴者应该就是以我们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我在2011年曾写道：“（文革前）社会上有多少个阶级阶层，学校中就有多少种“子弟”。在众多子弟中，被经常自称和他称的只有“干部子弟”——这个肩负特殊重大使命的群体。革命干部要打击阶级敌人，干部子弟就要帮助出身不好者，与家庭划清界线。革命干部要改造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就要帮助高知子弟改造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愚昧荒唐时代，这是天经地义的铁律，这是‘年年、月月、天天’重复的残酷悲惨的现实。”（《回忆与反思、感恩与忏悔》香港《明镜月刊》2011年9月期，页114）十七年的毒树，结出文革的苦果。文革伊始，干部子弟又充当“扫四旧”的打手，重现28年前，前辈纳粹党卫军“水晶之夜”的“悲惨世界”。清华校友中对“彻底否定文革”有异议，但“彻底否定老红卫兵”应该是共识。在中国的“水晶之夜”，近百万皇城“贱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无家可归之时，我还沉浸和陶醉在上天安门、毁二校门，抄家破四旧的神圣感和幸福感中——可耻可悲！曾参加党卫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拉斯说，“我曾被纳入一个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屠杀的体制。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更何况我还是干过坏事！

8月26日，《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清华红卫兵（刘菊芬执笔）的文章《清华园必须大乱》，被公认是中央对“八二四事件”的肯定。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

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把旧世界震动了，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老寄生虫都被红卫兵揪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和杀人武器被红卫兵拿出示众。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我当时更自认“抄家”和“毁二校门”的正确。上有中央支持、下有恐怖支撑，清华成了我们“清华红卫兵”的一统天下。当然，还有沈如槐讲的因素：“清华红卫兵斗黑帮是符合总理指示精神的，也得到清华大多数师生的认同。八八派没有听总理的话，仍然揪住工作组不放，是中央文革的讲话起了巨大的作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30）当时，要在总理和中央文革二者之间选边站，群众大多选总理而弃中央文革。几天内就有万余名师生员工报名参加清华红卫兵（当时在校学生一万、教工六千），我们精选八千，号称“八千子弟兵”。《清华文革亲历》第53页记载，“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和清华红卫兵联合斗黑帮，清华红卫兵不答应，说他们必须承认大方向错了，并要服从清华红卫兵的领导。”我们自认为的正义和正确，所表现的蛮横和霸道可见一斑。

八月底至九月初，清华红卫兵和“临筹”组织多场阶级教育会（如请全国劳模、掏粪工时传祥等工农忆苦思甜）和批斗黑帮会，双方各出一个头头主持，我曾分别与贺鹏飞和乔宗淮同台主持，文革后我们仍有私人情谊和工作交往。我在红卫兵总部中与刘菊芬和数力系的高晓红、在外系的红卫兵中与工化系的刘延东等三位鸽派女性观点同、私交好（因观点一致也因我本性懦弱），至八十年代仍继续来往。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开始了“大串联”，中央文革支持北京造反派到各地去“炮轰省市委”。为建立红色中国许多革命先烈都流血牺牲了，先烈们的那些流了血没牺牲的革命战友，即几乎所有的革命领导干部都要“摊上大事了”、要倒霉了！我们红色的革命接班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义不容辞地保护革命老干部。你说是“保爹保妈”，我一不在乎二不服气，反正中国基层不能乱。八月，我们“老兵”以保工作组的名义在北京保了众多派工作组的中央部委领导。九月，我们要主动出击，造反派可以到外地串联“造反”，我们当然应该去串联“保皇”，能保一个省算一个。我向红卫兵总部请假，说咱们红卫兵已掌控了清华，我要到西南去保皇。贺鹏飞和刘菊芬都很支持。■

附件五

叶不落归树

——读老淮文章有感

胡鹏池

看老淮文章，最大感想：此人真是天地之间自然生成的一个活物！率性而为，率性而文，聪明与调皮、真诚与戏谑同在、热情与不屑并存；调侃别人也调侃自己，开涮自己也开涮别人。

什么叫“文如其人”？什么叫“浑然天成”？这就是了。这样的本领都是性格中的遗传基因所致，没有这种基因，想学也学不成。

我虽然不认识这个人（现在已经认识了），但我相信就有这样一种人。这种人不是你，不是我，是一个叫老淮的清华人。大院子弟呵！八九老兵呵！得过势的，当过官的，掌过权的，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曾经牛逼”过的，如今呢？早就飘洋过海，连那个叫做“中国”的祖国也只在梦魂牵绕中！偶尔回来走一走，乡情、乡音、老熟人，反都成了逆旅中的风景，不久又回到供他衣食的新“祖国”去了。

谁没年轻过？谁年轻时不犯点错误？何况我们曾经在那样一个时代生活过大几十年，谁没有喊过“不要脸”的人才喊的不要脸的口号，谁没有做过“傻逼”才做的傻事。犯错误是必然的，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只有多少、大小、程度、性质的区别。从某种角度上讲“错误言论人人有份”也是社会真实，但从“错误言论人人有份”到“错误言论人人有责”之间，需要一个逻辑。没有任何一种逻辑能支持这种王八蛋的推论。只要没有“杀人越货”、“欺师灭祖”、“落井下石”、“构陷冤狱”——一句话，只要没有做过超越底线的事，大可不必去背着沉重的“粪袋子”去追求“灵魂救赎”。哥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们的灵魂一直就在我们的灵魂中，用不着婆婆妈妈、扭扭捏捏地去“救赎”。

我看老淮的全文，似乎他也并没有做过什么严重到“超越底线”，因而需要“灵魂救

赎”的事儿。当然，反思是人人必需的，良知的反思也是需要的。但不必像孙怒涛那样去作“良知的拷问”。

关于“灵魂救赎”与“良知反思”的事儿，我想多说几句。这事关系反思的尺度、角度、高度的问题，也是我与“文革应该否定，但不能彻底否定”的一些人的分歧所在。

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出来前，我曾劝他不要用“拷问”这个词，“反思”才是最准确的词。“反思”有深浅、宽窄的区别，但“拷问”不是它的最高级。“良知”已然是“良知”了，用良知去反思，反思良知都可以，就是不能“拷问”，良知一经“拷问”，出来的就不再是良知了。那么，“拷问”出来的会是什么东西呢？出来的是“逼供信”，或是毫无价值的“乱码”。老孙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个性，我只能理解他，但心底里一直存憾。

当然我觉得《良知的拷问》这本书还是有价值的，价值在于兼收并蓄，而不在于拷问“良知”。

老淮不断在成长，不断在走路，从“中干子弟”走向“黑干子弟”；又从父亲是“中干”，变成了自己也成了“中干”；再后来，又从“中干”变成了“不干”；从故乡走到了外乡，从“故国”走向了“月明中”；一路走，一路在回首，于是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达到了今天这样的程度；不简单！不容易！

我看老淮，从小就有良知，一路走来仍然有良知。只是遇上时代的沙尘暴，部分良知被蒙垢尘；在又一场时代的风雨中，尘垢终被雨打风吹而去。从风雨中走出来的依然是那个人，只是黑发变成白发了，小淮变成老淮了。

难能可贵的是猴子尾巴上的毛熬白了，于是猴成精。一看哪个什么人捂肚子、蹶屁股的姿势，准知道他要拉什么屎了。所以老淮的文章文风恢谐，道理深刻。

老淮是在说，你拉你的屎；我呢？叶不落归树！

我终于看明白，老淮自我推介的口号“叶不落归树”，其实就是俗话说的“去你娘的！”说得文雅点就是某位哲人所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读者来信】

小鹰谈高校文革史的编写

大学老五届是撰写本校文革史的主力。再过几年就写不动了。就算是一时写得不够全面，至少有个“靶子”，可以引起讨论。在编撰本校文革史之前把文革本身认识清楚，这样才能“纲举目张”、“胸有成竹”。例如，从什么高度上来看建国后十七年的毛刘之争？如何评价刘少奇等等，都是大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地肯定刘的“走资派”路线，就难以彻底否定毛文革和毛“路线”。也正因为回避了这些问题，一些人才大谈文革发生的所谓“心理”说、“阴谋”说、“争权”说、“试错”说，以及“官僚”说等等，以防“坠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阱”。

这一点对撰写清华文革史，尤其重要，因为刘少奇直接介入了清华的运动，无法回避。其它高校的文革史，没有这个难题，写起来要容易得多，虽然也有个“大背景”的问题。

作为编者，贵刊可以以“综述读者来信”的方式(只提内容，不提姓名)，适当地引导一下，避免“派性”，鼓励从大局和深度(包括理论和历史)上来认识文革，鼓励争鸣和回馈，同时利用贵刊的方便条件，牵线搭桥，鼓励私下“一对一”的研讨，推动文革的研究。

我觉得，文革史的写法有很多。除了事件的编年，数字统计，回忆录等，还可以从不同角度或不同专题，写政论和分析来“串联”史实。我写《清华文革反思》(http://www.azcolabs.com/xy_QHWG_2.html)，就是想把“红卫兵”在清华的兴起、鼎盛与衰亡的三个阶段，作为一条线索联系起来反思文革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或简称“毛刘之争”，并着重讨论了毛泽东与“红卫兵运动”的关系。可以说，这也是我的“清华文革史”。正如滤去实验的“数据涨落”之后，才可以看出“统计走向”一样，我试图避免那些“一言一语”、“一拳一脚”、“一刀一枪”的细节，而是从总体、从大背景、从过程来评价清华的“红卫兵”运动。但这只是一家之言。■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 行